

托洛茨基主义

[日] 对马忠行 著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江人民出版社

托洛茨基主义

〔日〕对马忠行 著

大洪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林焕文

封面设计：王祖珍

内部发行

托洛茨基主义

TUOLUOCIJIZHUYI

〔日〕对马忠行 著 大洪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第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6毫米1/32·印张 5 4/16·插页 2·字数 125,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统一书号：3093·297

定价：0.81元

译者前言

托洛茨基（1879—1940），原名列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犹太人，生于乌克兰。1898年在中学学习时因从事工人运动曾被捕流放。1902年自西伯利亚逃脱，侨居国外。1905年，托洛茨基回国参加革命，曾在短期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同年12月，托洛茨基被捕，1907年初再度由西伯利亚逃往国外。1917年，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历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23—1927年间，托洛茨基先后组织和参加了党内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6年被开除出政治局，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次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等地流亡，最后定居墨西哥。1938年9月，托洛茨基在巴黎组织了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抗衡。1940年8月21日遇刺身死。

《托洛茨基主义》是一部介绍和分析托洛茨基学说的论著。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的有关论述，回顾并分析了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关于战略问题的论争，回顾并分析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布哈林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以及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德国革命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斗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同时，作者在书中还以相当篇幅介绍了托洛茨基对苏

联问题的看法以及这一看法的历史演变，并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探讨和批判。

从总的政治倾向上说，这部书是力图为托洛茨基翻案的。但是它主要是通过理论分析，而不是对个人品质的毁誉、对秘史的揭露来论证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正确性的。书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例如，作者认为，不平衡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思想既非列宁的发现，也不是列宁的创见。前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早已有之，而后者早在1905年前后就已由托洛茨基提了出来。

作者指出，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革命战略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未来的俄国革命应该是特殊的一阶段革命，即结合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列宁直到二月革命时还认为，必须首先通过民主革命，打倒沙皇，完成土地革命，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改变了上述观点，主张在尚未完成土地革命的情况下就进行这种战略转变，因而在事实上接近了托洛茨基的主张。

作者认为，在俄国的革命战略问题上，列宁受马克思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文影响甚深，列宁的战略思想即源出于此。但是这篇文章的思想由马克思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做了新的发展，托洛茨基的战略思想就是与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9月后提出的新观点一致的，等等。

这部书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在力图为托洛茨基辩护，力图证明托洛茨基学说与马克思或列宁思想的一致性。在论证这种“一致”时，作者比较多地注意到了思想史上的联系，提出了一些

独到的看法。但是对争论双方所处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作者的分析 and 论述则显得不足，没有更多地注意将争论双方的观点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因此理论上的论述有时也就不免显得空泛，在论证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一致”时，某些地方也失之牵强。特别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提出了一些极其错误的观点，希望读者们在阅读时能够注意鉴别和批判。

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围绕着他和他的学说的争论都没有停止过。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面临着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今天，人们对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党内路线斗争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大的关注是毫不奇怪的，而这种关注当然也不会不包括对托洛茨基的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经闭目塞听，对国外有关研究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介绍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著作，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解决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无疑是有益的。这也就是译者把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的初衷。这里，对袁是之同志帮助校阅，表示感谢。

囿于译者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识者不吝教正。

译者

1983年4月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与“托洛茨基主义”	(1)
第二章 不断革命论	(22)
1. 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纲领	(22)
2. 不断革命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31)
3. 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与托洛茨基	(57)
4.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发展	(70)
第三章 论苏联	(89)
1. 苏维埃的热月与“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89)
2. “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缺陷与托洛茨基的国家 资本主义观	(101)
第四章 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与第四国际	(119)
1. 斯大林与 1923 年德国革命的失败	(122)
2. 第二次中国革命 (1925—1927 年) 的问题	(124)
3. 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	(130)
4. 人民阵线批判	(138)
5. 关于党的组织理论	(144)
6. 第四国际	(149)

第一章 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 与“托洛茨基主义”

据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涯》^①一书中说，“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名称是旧沙俄时代的立宪民主党领袖、历史学家米留可夫发明的。但是，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并广为人知，则是由于从列宁晚年到他去世后在苏联共产党内激化了的党内斗争。从那个时候，即从列宁卧病不起的1923年起，控制了苏联共产党的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就企图排挤托洛茨基。他们声称：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不同，后者是反列宁主义的。有了这种特殊的政治原因，托洛茨基主义才为人所周知。且不去说1917年二月革命后，幸乎不幸，由于在二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组织理论上针锋相对，并在革命战略论上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三人帮如此加以利用是很容易的，而且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当初（1923年秋—1924年）站在这场反托洛茨基宣传的前沿的，与其说是斯大林，倒不如说是季诺维也夫。虽然列宁在他的著名的《遗书》中曾警告说，不应利用二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一事作为对他进行个人攻击的理由，但是，由季诺维也夫带头，三人帮仍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此之后，于1925年与斯大林派决裂，并从翌年到1927年与托洛茨基派联合的季诺维也

^①《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1卷，第410页。

夫在反对派的一次集会（1926年10月）上，回答自己支持者的提问时曾坦白说：“同志们，这应当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情况就是如此^①。

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即有着反列宁主义意义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完全是在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派别斗争过程中，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派，或斯大林、布哈林派“发明”与普及的。因此，有必要谈一下这场党内斗争。

象今天已众所周知的那样，列宁在他的晚年认为，斯大林是权力主义、官僚主义的核心人物或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偏向的人。为了遏制斯大林，列宁在反斯大林的斗争中曾要求托洛茨基予以合作。但是，列宁中途病倒（1923年3月9日）。1924年1月21日，他志未遂而身死。从这个时期，即从1923年秋起，发生了党内斗争，并逐渐激化。

党内斗争，首先爆发于托洛茨基派与三人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之间。接着，到了1925年，三人帮分裂。斯大林一方面与布哈林、李可夫派结盟，一方面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排挤出去。结果，从1926年到1927年，由季诺维也夫派提议，形成了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的联合（联合反对派）。它们与另一方——斯大林、布哈林联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斯大林、布哈林派取胜。然而，获胜的斯大林、布哈林派也在胜利后不久的1928年下半年分裂。最后，布哈林、李可夫派被赶下台，从此开始了斯大林专政时代。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以及布哈林派都上了斯大林的各个击破的战术的圈套，被斯大林击败。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251页。

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尤其是托洛茨基派或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反对派，其失败的客观基础当然是西欧革命（尤其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如托洛茨基本人所屡次提到的那样。这无疑是不利于反对派的。但是，我认为，不仅仅在于这种不利的客观条件，反对派本身也有战术上的缺点。

例如，从一开始，在列宁晚年进行的反斯大林斗争中，托洛茨基就没有全力执行列宁提出的合作的任务。特别是在1923年3月上旬，列宁由于三次致命的发作而病倒后，托洛茨基并没有打算进行由列宁托付给他的反斯大林的斗争，他退却了。罗伯特·丹尼尔斯在他的大作《革命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①等书中写道，1923年4月召开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如果这个时候托洛茨基不后退，而是循着列宁的方针前进的话，胜利就是托洛茨基的了。不正是由于托洛茨基低估了斯大林，而宁可把季诺维也夫视为冤家对头，才落到了这步田地吗？总之，托洛茨基错失了时机。因为当他开始进行针对三人帮的反对派活动时，已经是三人帮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团结的1923年秋了。

在这一年的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错误的、不健全的制度”，要求用“党内民主”取代“书记处官僚主义”。在此之后约一个星期，著名的《四十六人宣言》（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执笔）——对托洛茨基表示赞同的四十六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被提交给党的政治局。这份声明要求党内民主，抨击了当时存在的价格剪刀差危机和经济混乱的弊政，强调了托洛茨基自1923年初就提出的有计划地发展工业的主张。总而言之，托洛茨基派（左翼反

^①R·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哈佛大学出版部1960年版，第8章《权力真空时代》。

对派)这时发动了反对当权派的斗争^①。

接着,在同年12月,托洛茨基向党的会议发表了在后来很出名的、称为《新方针》的公开信^②。当时的党的多数派,即以三人帮为核心的季诺维也夫派和斯大林派的联盟受到了这封信的攻击。从1923年秋到1924年,他们发动了猛烈地反托洛茨基宣传,在这场宣传中“发明”了带有反列宁主义含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结果,托洛茨基派遭到沉重打击。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25年,多数派本身分裂为斯大林、布哈林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后者在这一年的9月4日提出了《四人政纲》(这四个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及索柯里尼科夫),与斯大林派抗争。但是,季诺维也夫毕竟曾在过去挂帅攻击过托洛茨基派,所以据说托洛茨基派为季诺维也夫派被斯大林、布哈林派打败而幸灾乐祸,站在了对斯大林派抱善意的中立立场上。斯大林派则一面与布哈林派结盟,一面谋求托洛茨基派保持中立,孤立并集中打击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结果,在1925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派吃了败仗。这时,季诺维也夫派第一次向前几年的敌人托洛茨基派倡议联合。1926年4月,建立了由两派阵营组成的所谓联合反对派。这样,1926年到1927年间,在联合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然而,已受到重创的败军之盟是无法挽回颓势的。这场已失去时机的斗争结局,就象如今尽人皆知的那样。

托洛茨基曾多次强调时间在斗争中的重要性。他说:“一般说来 如果把时间作为政治的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在革命和战争中,

^①关于托洛茨基的这封信的节译,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9—11页。目前还没有《四十六人宣言》的日译本。在R·丹尼尔斯的英文著作《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239—242页上有这个宣言的节译。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12—21页。

时间的重要性就百倍增长。今天还可以干的工作到明天就根本无法完成。”^①然而遗憾的是，在党内斗争中，他似乎忘掉了这一点，几乎总是受制于人。不仅如此，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以及布哈林派的决定性失策，就是他们都轻视或无视提出了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要求的《列宁遗书》。诚然，联合反对派曾经拿出过这份遗书，但已为时过晚，使人有雨后送伞之感。如果这些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按《列宁遗书》的精神行事，就决不会遭到这种悲剧性的失败（尤其是季诺维也夫，他做出了无法形容的蠢举。在1925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说：“列宁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从而救了斯大林）。

不过，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即使是托洛茨基也违背了《列宁遗书》的精神，赞成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还曾一度——虽然是由于三人帮的强迫——否认有这份遗书存在（后来，1932年12月，在土耳其的流亡地，托洛茨基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关于列宁遗书》^②）。这份否认存在遗书的声明刊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9月号上。罗伯特·丹尼尔斯曾在《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一书中做了摘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过《遗书》之类的东西……流亡者、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孟什维克的报纸引用了列宁写的一封包含有组织上的建议的信（这些引用歪曲到失去了意义的程度），冒充《遗书》。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仔细地研究了这封信……关于隐瞒或亵渎《遗书》的所有议论都是有害的幻想，是完全违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实际意志以及他所缔造的党的利益的。”^③

这当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自愿写的文章。后来曾把许多托洛

①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

③R·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74页。

茨基著作译成英文的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马科斯·伊斯特曼，1925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名为《列宁死后》的书。他在这本书里摘录了《列宁遗书》，向全世界介绍。三人帮对此惶恐不安，他们强迫托洛茨基发表文章予以否认，并写了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同意在文上署名。后来，这似乎成了托洛茨基的一桩心事，他曾三次就此事进行辩解。第一次是在他写给他的同事穆拉洛夫的信中（1928年9月11日）；第二次是在杜威委员会举行的关于莫斯科清洗审判事件的听证会上；第三次是在他写给乔塞夫·汉森的信中（1940年2月29日）。虽然三次辩解的意思相同，但由于这是个重要问题，所以仍准备按时间先后引用。

“在反对派还没有把争论公开化，还寄希望于严格地通过内部的方法纠正党的方针的时候，为了维护反对派，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反对马科斯·伊斯特曼所采取的措施。1925年秋天，政治局内的多数派把他们炮制的、内容是强烈谴责马科斯·伊斯特曼的声明强加给我。我考虑到，既然反对派领导集团的所有成员都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倾向于做出许多让步，反对派当然不能为了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自行其是的伊斯特曼的个人问题而展开斗争。出于这种理由，根据反对派领导集团的决定，我在关于伊斯特曼问题的声明——这份政治局多数派用或是在已写好的声明上签字，或是卷入公开斗争的最后通牒来逼迫我在声明上署了名。

我至今仍然认为，现在根本没有理由去研究反对派在1925年的政策正确与否，那个时候别无其他办法。总之，我当时所做的关于伊斯特曼的声明，只能被看作是我们当时所采取的谋求调停及和解的方针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①。

^①R·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74—275页。

“伊斯特曼没有与我和其他人商量就发表了这个文件。由于采取了这种手段，他就使在苏联内部的、而且是在早已存在分裂端倪的政治局里的内部斗争变得极其尖锐。我们这一方面努力避免分裂。政治局的多数派希望，不，是要求我对此持鲜明立场。当时由我署名的那份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作是外交式的文件”①。

“听说，这些新道学先生们引用了我在伊斯特曼和列宁遗书问题上犯下的可怕罪行。多么卑劣的伪君子！当我们这一派为了避免为时过早的分裂而决定中止一切公开活动时，伊斯特曼自作主张，发表了这个文件。请不要忘记，这事甚至发生在建立有名的英俄工会和爆发中国革命之前，发生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出现之前！我们为了争取时间而不得不依靠策略。相反，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了向反对派发起促使其流产的挑衅，则企图利用伊斯特曼发表列宁遗书的事件。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是我必须在用我的名义、由他们写好的声明上签字，或者是他们因为这一问题而立即与我们兵戎相见。反对派的领导人一致认为，在这个时刻发生这种事情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我接受了最后通牒，决定必须在政治局起草的声明上签字。只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骗子才会把这种政治必要性偷换为抽象的道德问题。这些人成天高唱：“世界灭亡，正义万岁！”而他们平素的所作所为却只配记到比这种高调还要甜腻腻得多的帐本上去”②。

托洛茨基到1940年时仍然认定，他1925年采取的否认《列宁遗书》的方针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只能叫人吃惊。他的这些辩解本身托出了托洛茨基派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左翼反对派在1925年所采取的斗争方针仍然是所谓“谋求调停及和解”，这实际

①《列昂·托洛茨基事件》英文版，第429页。

②《捍卫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360页。

上是被动的战术，是极其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已讲过，并在其他书中提到过^①，这里就不谈了。第二，即便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在否认重要政治文献《列宁遗书》的文章上署名的重大行动也表明，托洛茨基低估了列宁遗书本身的重要性。伊斯特曼没有与反对派的同志们商量就公布了遗书（不过全文是发表在1926年10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固然不妥当，然而一旦发表后，无论怎样讲“争取时间的策略”，也绝对不应在否认遗书的文章上署名。这样做毕竟是因为没有足够重视这份遗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果仅仅把握住这份遗书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最高度的重要性，那么至少也会为在否认遗书的文章上署名一事而踌躇不前了。

然而，不仅仅是由于“比这份短短的、仅仅有两页的《遗书》更令人惊叹的文件在政治史上还闻所未闻”（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语。译注：此人曾作过托洛茨基的秘书），而且还在于，这是一份对左翼反对派无比有利的文件。今天如果反复研读这份遗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托洛茨基不是在列宁在世时召开的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1923年4月举行），而是在约一年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才得知列宁留下了《遗书》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左翼反对派倘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份遗书的重要意义，以它为指导精神开展活动，局面就会大不相同。对托洛茨基派来说是如此，对季诺维也夫派和布哈林派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悲剧性失败可以说是他们在这场斗争之初就抹煞《列宁遗书》的报应。

书归正传。1926年到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派（多数派）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反对派）的斗争点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针对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化而提出的无产阶级民主要求；

^①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3—24页。

第二，关于农业、农民问题以及工业化争论的国内经济政策问题，即围绕着反对派提出的强调有计划地实行工业化以及推行镇压富农政策的主张而展开的争论；第三，在关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特别是在关于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年—1927年）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采取尾巴主义方针的多数派与强烈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恢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反对派间所进行的争论。但是，与当时的国际革命运动以及苏联的经济状况、工业化争论相联系，成为上述争论的基础的总问题是：在落后国家苏联是否有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争。多数派主张这是可能的，而反对派则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究竟是谁继承了列宁的衣钵呢？斯大林派的一贯宣传当然说是他们自己。由于这种宣传一直广为流行，许多人至今仍深信不疑。

但是，在“斯大林批判”之后，真相逐渐明朗，而且还在变得更加明朗起来：不，事情并不象斯大林派所宣传的那样。毋宁说，反对派才基本上是列宁主义的，而斯大林派倒恰恰是修正派，难道不是如此吗？例如，即使拿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革命以来的基本理论就恰恰是主张不可能论。托洛茨基曾经详细地援引文献来论证这一点。特别是读了他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的第1章^①以及《论一国社会主义》^②等文，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由于我们在解释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时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就不赘述了。不过，列宁在世时根本没有提出过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点实际上已由斯大林自己作了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

②《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附录部分。

旁证。1924年4月，列宁去世后不久，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在这篇讲演（初版本）中，他这样论述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还不能说，在一个国家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实现。不与若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我们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吗？不，不能。一个国家的努力是足以打倒资产阶级的，我国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仅仅靠一个国家，特别是靠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还需要若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因此，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要任务。一个国家胜利了的革命不应固步自封，而应把自己看作是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柱和助动力。”

布哈林也是如此，他也是一直反对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①。如托洛茨基所揭露的那样，有讽刺意味的是，1921年发表的下面这些否定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正是由布哈林起草，由当时包括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内的党的政治局加以肯定的：

“在苏联，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经过与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年英勇斗争，无产阶级保持并加强了他们的苏维埃政府。然而，尽管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就工业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落后国家。俄国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

^①见布哈林的一些论文：1917年写的《俄国的阶级斗争与革命》，1918年写的《从沙皇制度的崩溃到打倒资产阶级》，1919年写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等。

发展时代。”^①

但是，在阐述了不可能论的同一年12月，斯大林在他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②一文中却提出了与不可能论背道而驰的可能论，并且自《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第二版（1924年12月）起，删去了前面引用过的那段文字，而主张：“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布哈林（列宁在世时他基本上是党内的极左派，列宁去世后变成了党内右派），就是这个布哈林也随着斯大林主张的变化而改变了观点。

为什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观点却变得截然相反了呢？

一种说法——例如，按照斯大林的神话，这是由于，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以1924年前后为基本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形势逐渐低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所谓相对稳定时期。斯大林及时抓住了这种形势变化，提出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赢得了人心，这是斯大林获胜的根本原因。但这决不是真话。诚然，1924年是走向相对稳定时期的转折点。但是三人帮控制的领导机关是在1925年到1926年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这比时局的发展要落后一年半。1924年到1925年，他们还没有这种认识。就象在1924年年中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他们在这时还是认为德国革命即将到来。看一看季诺维也夫这一时期的言行或斯大林在1924年9月发表的《论国际形势》一文，这一点就清楚了。在这篇论文中，斯大林强烈谴责了那种认为“决定性的战斗已经发生过了，无产阶

^①《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第4章。

^②《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10—343页。

级在这些战斗中已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欧洲革命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处于“普遍的经济不稳定”，“工人正在走向革命”^①。

所以上面那种说法并不真实，而是后来编造的臆说。毋宁说，斯大林改变主张的真正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与三人帮的权力之争。

作为论文集《1917年》的序论，托洛茨基在1924年10月发表了涉及到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失败一事的长篇论文《十月的教训》^②。这篇文章暗中抨击了当时的三人帮，特别是抨击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然而，在1923年10月德国革命的失败上，与季诺维也夫相比，斯大林有更大的责任——这一点托洛茨基后来也提到过^③。“现在看来，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与斯大林集团间无疑正滋长着不和的时候，却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朋友硬推到斯大林一边去，托洛茨基的这种搞法无疑是战略上的失败”^④。总之，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派的这一攻击刺激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在1924年底，甚至秘密建议开除托洛茨基。虽然斯大林认为这样干还为时过早，拒绝了这个提议，但1923年秋以来，持续进行的反托洛茨基宣传的调门却更高了，以致于到了1925年1月，托洛茨基竟被迫辞去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

这一时期，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的理论核心就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的。可以说，不断革命论是使托洛茨基主义之所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将在下

①请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247、255页。其中“欧洲革命被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一句，系译自本书引文。此句在斯大林全集中文本中为，“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迟延”——译者。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

③《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1—322页。

④丹尼尔斯基《革命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243页。

一章里详细阐述。总的说来，在这一理论中有两点明显的主张。第一是关于在帝国主义阶段，落后国家的革命是一阶段革命的战略理论。第二是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中第一个命题当然是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前提出的战略，即著名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个二阶段革命的战略理论相对立的。所以乍看上去，托洛茨基主义恰恰是反列宁主义的“发明”。因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向它扑了过去。然而，如前所说，第二个命题所提出的关于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理论并无不同。可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反托洛茨基宣传的矛头所向，却居然到了要修正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地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到底没有走得那么远，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做的这种修正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的富农政策使他们感到恐惧，所以三人帮终于在1925年分裂，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发展到了对立的地步。

为什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走得那么远呢？在1924年到1925年间，加米涅夫还是这样攻击托洛茨基的：“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早就消失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无视农民的作用，丝毫也不考虑工农联盟这个有着决定意义的问题，企图使俄国的工人政府全部依赖于将要来临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①。

但是，与斯大林的重大不同在于，加米涅夫的这篇文章没有把“俄国的工人政府”与“俄国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过渡时期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同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间有重大分歧。在反托洛茨基的宣传中，只有斯大林把他在1919年4月所阐述的俄国

^①加米涅夫《党与托洛茨基主义》，引自丹尼尔斯的著作。

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同年12月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俄国有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什么唯独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到了这一步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涯》中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缺少骨气，但在理论上、政治上比斯大林要强。“他们有在流亡期间，在列宁领导下所掌握的、比斯大林要广博得多的对于国际情况的认识 and 了解”^①。相反，在不懂外语，几乎没有国外流亡经验，不了解西欧的斯大林身上，民族狭隘性是非常强烈的。列宁在他晚年写的信中，就格鲁吉亚民族问题抨击了斯大林派，指出了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倾向^②。《列宁遗书》中则进一步指出了斯大林的权力主义倾向。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宣传发展到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主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了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可能论。这样干恰恰是同他的个性相吻合的，至少也决不是同这一点没有关系。

象后而将要论述到的那样，这种可能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它带有合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权力主义者斯大林胃口的暴力论的性质。但是，不应忘记，斯大林在改变观点的时候，曾利用了列宁的两篇论文，即利用了《论欧洲联邦的口号》（1915年）以及列宁在晚年写的《论合作制》（1923年）等文中的词句，企图把可能论装扮成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在他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第1章）等书中，已揭穿了这种荒谬伎俩。不过，由于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斯大林的荒谬伎俩，所以出于揭穿它的必要，我准备先谈上几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的1915年，列宁指出：“经济

①《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卷，第934—935页。

②《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369页。

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①

列宁的这篇文章被斯大林、布哈林视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证据。然而，这是根据对列宁文章的荒谬的、错误的理解所做的歪曲。因为，第一，这里所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与其说指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倒不如说指的是过渡时期，即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托洛茨基说：

“列宁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而抱有那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落后国家建立这种社会的幻想。他考虑的是更现实的东西。这就是我国在十月革命初期已经取得的成果。这大概还需要证据吧？这种证据多得不胜枚举。

列宁在他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纲领（1918年1月7日）中曾经说过：‘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②。同年，即1918年初，他在以《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为题的、抨击布哈林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③

^①《论欧洲联邦的口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

^②《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416页。

^③《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309页。

列宁怎么会假设这样短的时间内使‘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呢？他在这段话里放进了什么样的物质的、生产的以及社会的内容呢？

这个问题使我们想起了列宁1918年4月29日在向苏维埃政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时所讲的下面这段话，这同列宁前面讲的那段话看起来迥然不同：‘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①。1919年2月3日，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的大会上进一步坦率地指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②

在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列宁在哪种情况下讲的话是正确的呢？是说‘社会主义一年之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的时候呢？还是说不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制’留给我们的儿子，而是留给我们的孙子的时候呢？——两种情况下列宁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因为他所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两个完全不同的、不能等量齐观的阶段。当列宁说‘社会主义一年之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的时候，他并不是指要在一年，或‘几个月’内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即不是说要消灭阶级、消除城乡间的矛盾。他的实际意思是要恢复已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机械厂、工厂的生产，由此确保城乡间产品交换的可能性。这一短暂的时间本身就是全面理解列宁这段话的关键。当然，甚至就连完成这一初步的工作，列宁在1918年初所设想的时间也还是太短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不留情地嘲笑了这个实际上的‘失误’。正确地、全面地展望前途，我们一刻

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75页。

②《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75页。“社会主义劳动制”一词在原书引文中为“社会主义秩序”——译者。

也不要相信在一年内、而且是在落后国家可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劳动制’。按列宁的说法，这个主要的、最终的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的实现要交给三代人去完成，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辈。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里所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也并不意味着创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说的是我们在苏联已实现的、要初步得多的工作。这还不是很明白的吗？倘若不是如此，根据列宁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荒唐结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得不把革命战争‘延长’到第三代人。”^①

其次，不仅如此，“列宁的这段话并不是针对俄国写的，他是在对照俄国的情况谈论西欧的事情”。如列宁当时的一些文章（如《若干纲领》、《论革命的两条路线》等）所说，当时在列宁看来，俄国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还没有直接面对社会主义革命，面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还只有西欧各国。所以上面那些话自然谈的是西欧各国。因此，托洛茨基说：“抓住了其他谈论西欧的言论，给这些话附会上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的，而且实际上也没有的意思，并把它说成是在谈论它根本没有涉及的国家俄国，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新理论”^②！

加米涅夫在第十五次党的中央全会（1926年11月）的演说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引证了列宁的《若干纲领》，说：“同志们，我们不能不认为，列宁在1915年所说的关于在一个国家创建社会主义的话显然指的是西欧各国”，这时，会场上的斯大林派发出了“胡说八道！”等等怪叫，加米涅夫遭到了厚颜无耻地奚落^③。

被斯大林、布哈林引为证据的另一篇文章，就是《论合作制》，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6—28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9页。

③丹尼尔斯基《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294页。

他们利用的是下面这段话：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以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操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①

但是，由于这段话而认为列宁论述了仅仅在俄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文章通篇的主要着重点都是为了指出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它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意义。如托洛茨基所说，这篇文章强调了“工人国家完全可能、而且必须改变合作社的社会作用，只要政策对头，合作社就能沿着社会主义渠道，使私有农民的利益与国家的总利益结合起来”，而且它还指出了“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它仅仅是一篇这样的文章而已。

当托洛茨基这样说时，他确实是正确的：“当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条件时，列宁严格地限制了他这篇论文的主题。在

^①《论合作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23页。

这篇文章中，他把构成我们的基础的苏维埃制度作为必要条件，仅仅谈到了在没有新的阶级动乱的情况下，通过分散的小农经营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的问题。这篇文章仅仅提出了从小规模的私有商品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社会形式和组织形式，而没有论述这一过渡的物质条件和生产条件。即使今天欧洲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来援助我们，作为调节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方法和组织方法，列宁提出的合作社问题今天也仍然保持着它的意义……”^①

“列宁在同一时期，即在1923年初写的文章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在这种场合，列宁是从这样一种猜想出发的，这就是：西欧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要在他们前面到达社会主义。关于合作社的论文丝毫也不包含这样的暗示，即不包含苏维埃共和国也许通过调和的、改良主义的手段创立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以取代通过敌对的、革命的发展过程进入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暗示”^②

我想，以上这些事实足以戳穿斯大林、布哈林派的伎俩了。但是，为慎重起见还应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自1905年革命以来，列宁阐述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论是多得无以计数的。象前面已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几乎罗列了这方面的全部文献。在后而解释不断革命论时，我将对其中的一部分加以介绍。

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总之，应强调指出，所谓斯大林出色地把握了苏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倡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等说法^③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实际存在的只有上面谈到的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33页。

②《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48页。

③举例来说，请看安娜·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日本米斯兹书房出版。

那些关于斯大林的情况。至于布哈林的变节，恐怕除了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外，还没有能对此加以说明的资料。罗伯特·丹尼尔斯写道，在1923年4月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还是支持左派的，可是到了这一年年底，他已经站到了反托洛茨基的三人帮一边。他到底是怎么从党内极左派或左派的支持者变成党内右派的呢？目前还缺乏资料来清楚地解释这一点。布哈林曾写过《评继续革命的理论》、《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批判》等许多反托洛茨基的文章^①。《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19号、20号）刊载的他的《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文^②，对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最详细的论述。然而尽管如此，和斯大林如出一辙，布哈林的根本论据仍然不外是对前面提到的列宁的那两篇文章的歪曲。

布哈林是一位远比斯大林卓越的理论家。不过，我们只能认为，他最终还是由于权力斗争而追随斯大林，并因此而改弦更张。后来，他失悔于同斯大林的联合。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于索柯里尼柯夫的斡旋，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举行了秘密会谈，要求加入了已处于日暮黄昏的反斯大林阵营^③。不过，1926年到1927年间，在斯大林派与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斗争时，布哈林还是曾经伙同斯大林，大肆鼓吹过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

如上所说，有着特殊政治意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起源于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而被炮制出来的——其出现的根

^① 这些文章都已译成日文，收入了1929年白杨社出版的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第13卷中。斯大林的文章则收入了这部著作集的第12卷等卷本组。

^② 斯大林、布哈林著作集日本白杨社1929年版，第10卷，《建设社会主义》部分。

^③ 丹尼尔斯《共产主义文献史》1960年版，第1部，第308—309页。

源正在于此。不过，事实上，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也存在着使人们便于利用这种花招的一面，它是易于被人们如此加以利用的。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就是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下一章里将详细加以说明。托洛茨基的敌人自不待言，甚至连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也并不十分理解。因此，是把托洛茨基主义从被歪曲、被作为贬义词使用的“托洛茨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第二章 不断革命论^{*}

1. 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纲领

首先从“不断革命”一词谈起。在我国，这个词过去一直被译成“永远革命”，并已约定俗成。但是，我认为这一翻译是不恰当的，因此将其译为“不断革命”。^{*}托洛茨基根本没有设想过什么永远革命。“不断革命”是一个表示社会变革的阶段性及其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的字眼。托洛茨基自己也说过，这是马克思的话，它意味着连续革命、不间断革命。托洛茨基本人曾多次使用过这个词（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陈独秀时代起，就把这个词译为“不断革命”，这比译成“永远革命”要好得多）。

这个词原来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它表现了社会变革的阶段性以及这一变革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它一般地要求并表明：无产阶级必须为使资产阶级革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成长为国际革命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撰写过论述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前途与任务的著名文献《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与这一文献有关的问题，下一节里将较为详细地谈到。在这份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消灭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对

^{*}在日文原版书中，作者译为“持续革命”。考虑到我国习惯，本文中把这个词均改为“不断革命”——译者

资本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改良等要求——引者)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阶级手里的时候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文——“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一文也指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②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3章里,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③。

托尼·库里夫在《不断革命论》一文中指出:“托洛茨基的理论是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所做的分析的发展、运用和扩大”^④。马克思的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革命论的关系问题,下一节里将专门论述。总之,我认为,在对马克思的革命论的“运用和扩大”中,托洛茨基发挥了其天才的独创性,适应新的条件加入了新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新因素的基本特点就是支撑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而其中又有两点主张最为显著。

托洛茨基写道:“1905年到1917年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

①《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1、299页。

②《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05页。

③《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04页。

④参见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278页。

意味着这样一种革命观点，即不让无产阶级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使其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到了1924年秋(斯大林修正列宁，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引者)，‘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意味着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一国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①

就论争史而言，情况确实如此。然而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所包含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割裂的。只是在1905年到1917年间，成为争论对象的是前者，而后者的问题还不成其为问题。这是因为，后者的观点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不可能引起争论。到了1924年末，由于斯大林修正列宁主义，它才成为受到攻击的论点之一。众所周知，1905年到1917年间，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不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的观点之所以成为争论对象，是由于它与列宁的二阶段革命论、列宁著名的革命公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论是对立的，或被认为是对立的。

1905年革命前，在认为行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是没有分歧的。决定性的差别是，孟什维克认为，既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自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停留在施加某种程度的促进压力的反对党的位置上。与此相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张，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能力，要依靠，也只有依靠坚持对资产阶级采取不妥协态度（麻痹自由资产阶级）的、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工农（作为整体的农民）同盟军，才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即便是作为一种特殊

^①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59页。

形式，它归根结蒂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是在制度上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民主专政”。1904年9月后在组织上处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观点，他虽然也承认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却认为不可能建立这种联合专政，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只能指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建立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通过执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取得农民大众的支持，反而会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得更容易一些。但由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已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就不应是两阶段战略，而是一阶段战略，特殊的一阶段战略。在此之后，以波兰革命问题为契机，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第三国际纲领（1928年）中（不是在由布哈林起草的最初的纲领草案里）也写上了“兼有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公式。其实，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文中所说明的※，十月革命本身就是这类革命之一。事实上，自1904年起，托洛茨基就在倡导这种十月革命的公式了。

由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战略论争曾被俄国共产党内的反托洛茨基派最大限度地利用，所以在后面将详细叙述这一论争。如果一定要在这里谈一点儿的话，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自托洛茨基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概要论述其不断革命论的著作《总结与展望》（1906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他的思想有着完整的历史。据托洛茨基说，这一思想产生于1904年。特别是，“正好到了1905年1月9日事件与10月罢工期间，笔者形成了这些后来被命名为‘不断革命论’的见解”^①。翌年，在狱中，托洛茨基归纳并写下了他的上述见解，且使之理论化的著作《总结与展

※请参看《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9卷，第144、194、303页，以及第33卷《十月革命四周年》等文。

①托洛茨基《“1905年”1922年版序言》。

望》。此后，特别是在列宁去世后，即1924年后，以党内斗争为契机，这一思想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总结与展望》曾作为1906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我们的革命》中的一部分发表，但这部书立即被没收，而未能广泛传播。此书曾于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再版）。

托洛茨基本人曾在1928——1929年写的《不断革命论》中说：“今天，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要求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给予它以最大的关注。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进程完全并最终使人们在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旧见解的分歧进行回顾时提出这个问题，并使之一般转化为国际革命的内在联系和方法、国际革命性质的问题。”

在1929年所作的《不断革命论》一书的结论部分（该书第10章“什么是不断革命？——其基本要点”）的一开头，托洛茨基指出，《不断革命论》是作为对卡尔·拉狄克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发展与意义》，未公开发表）的反批判，在1928年写于流放地阿拉木图，并于翌年在土耳其的流亡地加以补充后成书的。同年，他对不断革命的理论作了简洁、概要的阐述。除他所阐述的最后一条外，我准备在下面全文引用。因为，自托洛茨基于1904——1905年形成了其革命设想以来，通过后来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探讨，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以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早期相比，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内容没有变，只是更加丰富了。特别是，它已经从俄国的革命论“一般转化为国际革命的内在联系与方法、国际革命性质的问题”。此时的托洛茨基已经不仅是俄国革命的一位左派领袖。虽然被斯大林派打败、驱逐，但这位十月的英雄已处在国际共运的领导者的地位上。他的着眼点从俄国扩大到了世界。

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要点是什么呢？托洛茨基本

人曾这样深思熟虑地归纳了他同斯大林、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的对立：

一、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意味着：只有通过作为附属国、特别是作为农民大众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完全并真正解决民族、民主解放的任务；

二、不仅农业问题，就连民族问题也使得构成落后国家居民大多数的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处于不寻常的地位。不与农民结盟，无产阶级就不能解决、也无法真正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做不调和的斗争，这两个阶级的同盟就不可能实现；

三、无论各国革命的序曲阶段情形如何，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同盟都只有在组织成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的政治领导下才能实现。其次，这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以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只有通过将首先解决民主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

四、历史性地确定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工农民主专政”恰好表现了无产阶级、农民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具有上述性质的关系。这一点已由十月革命的经验予以肯定。但是，列宁的老公式却未事先解决这一问题，即：在革命联盟内部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如何？换句话说，这个公式慎重地保留了选择的余地，以便在历史经验的进程中寻求更加正确的答案。不过，虽然历史经验的进程告诉我们，在不会招致任何误解的情况下，农民的革命作用是何等的伟大，但尽管如此，农民既不能发挥独立作用，更不能起领导作用。他们或者跟着工人，或者追随资产阶级。这说明，“工农民主专政”只能被看作是统率着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五、从阶级内容上看，工农民主专政作为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一种制度，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各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全部近代史——特别是近二十五年来俄国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因此，在一切决定性的场合，特别是在战争还是革命的抉择面前，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总是与大资产阶级一道走；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则与无产阶级携手前进；中层将不得不在这两极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因此也就不存在工农民主专政；

六、第三国际企图把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早已在历史上用滥了的口号强加给东方各国的努力，最终只会起反动的效果。只要把这个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起来，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大众中解体，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从而也就是为民主革命的失败创造出最有利的条件。把这个口号写入共产国际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传统的直接背叛；

七、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迅速地而面临解决与深刻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并由此形成不断革命；

八、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没有完成革命，而只是使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以民族的以及国际规模的阶级斗争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占压倒优势的条件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场斗争的爆发。这就是说，在内部导致内战，在外部导致革

命战争。无论被卷入这场斗争的是昨天刚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有着已经经历了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漫长时代的背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同样具有不间断性；

九、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同民族国家的疆界不相容了。因此，一方面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资产阶级欧洲联邦的幻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民族的舞台上开始，扩展到国际舞台，并在世界舞台上结束。用更新的语言，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成为不断革命，一直到新社会的最终胜利在我们所居住的整个行星上实现为止；

十、以上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做了概要的描述。这份草图排除了现在的第三国际纲领的玄学的、毫无生气的分类精神所提出的问题，即“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分工以及世界规模的生产力，它就是在为全部世界经济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

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取得政权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因而不可能结束民主革命。与此相反，在民主革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国家，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在此之后的命运最终不是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主要是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十一、由于对十月革命的反动面发酵膨胀起来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永远同不断革命的理论对立的。

在我们批判的鞭撻下，效颦者们以俄国的特殊性(地大物博)

为由，企图把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应用范围仅限于俄国。但这种尝试非但没有使情况得到改善，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斯大林、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纲领中说，中国等落后国家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引者）。与国际主义立场的决裂通常必将导致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主张只有本国才能起到其他国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将这种作用归诸于本国的素质和特殊的优越性。

世界性的分工、苏维埃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世界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十二、违反了俄国革命全部经验的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不仅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机械地进行对比，而且也割裂了民族革命与国际革命。

这个理论提出的任务是，在落后国家革命中建立民主专政这种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不可能实现的制度，从而把幻想和虚构带入了政治。它麻痹着东方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妨碍着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从效颦者们的理论观点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本身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按斯大林的公式就是完成了十分之九）和民族改良时代的开始。克拉克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论点，归根结蒂是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紧密相联的。

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就被降低为仅仅是与军事干涉作斗争的辅助性武器。第三国际的现行政策、体制以及领导人的遴选，完全是与共产国际降低为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辅助性部队的情况相适应的^①。

^①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09—313页。本书根据新的英译本对引文作了一些改动——引者。

2. 不断革命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我曾说过，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有支撑着这一理论的、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观点。其中有两点前面已谈到了一些。后两个，一个就是前文引用过的基本纲领中的话：“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再一个就是托洛茨基的农民论，上述纲领中这样写道：“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这种农民论正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前与列宁在战略论上产生分歧的直接基础。关于这一论争，后文将作说明。这里首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托洛茨基在其早期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有这样一段名言：

“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成长，变得更强大有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不是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要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关系和国际情况，并最终取决于若干主体性因素，即传统、工人的斗争主动性及斗争准备等。工人在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比在先进国家更早掌握政权。1871年，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工人有意识地把政权拿到了自己手中。但是，在大资本家的中心区域英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工人哪怕连一个小时的政权也未掌握过。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依赖于技术发展和国家资源是荒谬的、是单纯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在我们看来，俄国革命将会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在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得以有机会充分发挥其统治能力之前便将政权转入工人手里——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必须如此。”^①

“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俄国的政治解放将使这个阶级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给予它巨大的资本和力量。历史已经使工人阶级成为对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清算的先导者。”^②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会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在下一节里将会谈到。虽然马克思曾经说过：“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③，但在俄国革命家中，预言落后国家俄国将先进行革命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而列宁甚至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还认为，欧洲会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后来，托洛茨基根据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复合发展规律，对局势作了一般性的解释。对不平衡发展（国与国、政治与经济以及其他等等）规律虽然无须加以说明，但“复合发展规律”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故引用如下：

“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最普遍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另外一条规律，它还没有恰当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复合发展规律。我们用这一名称来表示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相互吸引、各个阶段的结合以

^①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1—62页。

^②同上，第133页。

^③《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4页。

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混合。”^①

列宁在1915年曾经说过：“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②。众所周知，斯大林曾用这段话作为他的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据。斯大林还大肆宣扬说，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是列宁的新发现。然而，不能设想马克思、恩格斯会不知道不平衡发展。把列宁的话作为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也是毫无道理的歪曲。本书第一章中已对此做了阐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更早、特别是更有力地在其革命学说中运用了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是托洛茨基。因为他的不断革命论正是建立在国家与国家、或政治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上的。不是二阶段革命，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飞跃式地结合为一个阶段——托洛茨基的这种特殊的一阶段革命论以及他提出的俄国将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恰恰是托洛茨基对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表述。当然，如下一节所说，这些思想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在《不断革命论》中，托洛茨基针对着斯大林写道：

“在这场讨论中，令人最难容忍的就是斯大林的‘理论化’。其中，有构成他的全部理论家当的两件装饰品：‘不平衡发展规律’及‘阶段不可超越论’。斯大林至今也不懂得，超越阶段（或在一个阶段的停滞）正好构成不平衡发展本身。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装腔作势，提出了不平衡发展规律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但是，在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能比先进的英国更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见

^①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1分册，第17页。

^②《论欧洲联邦的口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

正是全面依据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的。”^①

当然，如果把托洛茨基的落后国家先革命论理解成、或歪曲为普遍的、必然的，那么就会接近一部分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谓“边缘地带革命论”了。托洛茨基仅仅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有先进行革命的可能，而他比列宁、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俄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托洛茨基认为，即使是不平衡发展也是有限度的。诚然，落后国家俄国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仅仅在这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落后国家比先进国家晚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这里已谈到了托洛茨基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只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托洛茨基说：

“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我们只能有把握地说，远在俄国技术的落后性绊住后腿之前，这一政策就将遇到政治上的障碍。毫无疑问，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可能将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另一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将使我们有可能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统治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专政”^②

“如果只依靠自己的手段，俄国工人阶级在农民背弃他们时，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压垮。除了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命运，从而也就是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外，俄国工人阶级别无选择。俄国无产阶级将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暂时危机所带给他们的巨大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70页。

^②《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28页。

投放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天平上去。”^①

1915年，在提出了“欧洲联邦”的口号的著名的《和平纲领》中，托洛茨基写道：“如果这种情况（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没有发生，那就不能指望革命的俄国会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生存下去，不能指望社会主义德国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孤独地站住脚跟。理论考察和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1922年为这本书加的跋中，托洛茨基说：“《和平纲领》中曾反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也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这个观点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将近五年的经验所驳倒。但是，这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一个工人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同全世界抗衡，并生存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威力。如果在其他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度，这种威力将会创造出真正的奇迹。就政治、军事意义而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捍卫了自己，但却尚未达到，甚至尚未接近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取得胜利后，真正的俄国社会主义经济高潮才有可能到来。”^②

总之，“在农民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工人政府所面临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有可能解决”^③。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重要属性。到了后来，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逐渐扩大，以致于认为，无论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一般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理论的论据是什么呢？

“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尽管俄国从历史上

①《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44页。

②托洛茨基《〈和平纲领〉1922年版序言》。

③托洛茨基《〈1905年〉1922年版序言》。

说是落后的，但是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俄国无产阶级仍能通过革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在被资本主义敌对世界所包围着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种种矛盾，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才能找到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第一个命题是出自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第二个命题则是依据对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政治纽带的不可分性的正确理解。”^①

这是托洛茨基的杰作之一《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的话。就我所知，如果把这本书的第1章（《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与《俄国革命史》的附录《论一国社会主义》对照起来读，就大致上可以理解托洛茨基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前者尤为详细，其论据主要有两个：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提。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仅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在另一方面还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二、“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政治纽带的不可分性”。特别是今天各民族国家的生产力不是孤立的，而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或者说，甚至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国家疆域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来说也还是过分狭小了。“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从世界分工出发，最高度地发展物质资料和服务的国际交换”^②。以上简单谈了这两个主要论据，下面再进一步做些介绍。

托洛茨基认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形式，而且使民族国家的疆界也变得狭小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在同等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针对着生产资料私有以及民族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割裂。东方各民族的独立斗争包括在这个世界进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创立民族社会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40—41页。

^②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主义的目的即使能够实现，也会对人类的经济力量造成巨大破坏。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所谓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①

他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的分散的不平衡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也出现了时间上有先有后的、不平衡的、分散的性质。由于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高度紧张，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②

“为满足人类需要，社会主义要有计划地、协调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实现它的合法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脱离实质上是世界性的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是过分狭小的各个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域。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③

托洛茨基强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因此，他认为，不仅象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他起初就是这样看的——就是象英国那样的先进国家也不可能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在《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托洛茨基写道：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布哈林起草）的第4章里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三部分，即：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二、‘处于资本主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1917年前的俄国、波兰等）’；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

事实上，与今天的美国相比，‘1917年前的俄国’要与今天的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② 《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52页。

③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中国接近得多。在这个图解式的分类中，如果不是存在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分类与草案其他部分相联系，成了错误结论的根源，那么谁也不会对它认真地提出异议了。草案可以说，‘中等水平’的国家拥有建设独立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在话下，需要外部援助的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工农业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地位等其他条件抛开，而单凭这种标准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新的、同样是严重的谬误和矛盾中。刚才谈到了英国。英国无疑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英国没有在本岛范围内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的机会。一旦被封锁，英国在数月内就会窒息而死。

的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极其有利的。如战争中的资产阶级德国所证明的那样，即使被困在封锁圈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能使经济生活富有很大的弹性。然而，对于这种先进国家来说，在民族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普遍的衰退和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换句话说，这是与社会主义的任务背道而驰的。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忘记了当代生产力与民族疆界的矛盾这一基本命题，忘记了虽然原因相反，但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来说，高水平的生产力比低水平的生产力所遇到的障碍决不更小。对于后者来说，是缺乏足够的基础；而对于前者，则是基础方面将会变得贫乏不足。正是在最需要不平衡发展规律、不平衡发展规律也最为重要的地方，这一规律却被丢到了脑后。”^①

“对于后者（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引者）来说，是缺乏足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57—58页。

够的基础；而对于前者，则是基础方面将会变得贫乏不足”。首先，也许人们会对此产生疑问：如果“缺乏足够的基础”，难道不可以先提高生产力奠定“基础”，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吗？但是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发展生产力阶段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或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其他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那么这自然要另当别论。但倘若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就不能不是非社会主义的或反社会主义的。总之，正象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后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说过，“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指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②。人们应该思考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其次，“对于前者（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引者），是基础方面将会变得贫乏不足”。举例来说，没有海外资源和贸易等，英国这个拥有高水平生产力的国家就会站不住脚。如果海外资源和贸易被切断，生产力很快就会下降。所以说，在大不列颠岛上也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愈发达，与外界的联系就愈密切，如果这些联系纽带被切断，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反而会遇到更多的经济障碍和经济困难。因此，虽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原因相反”，但可以把握地说，一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然而，如果英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通过某些措施，使得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及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取资源的途径没有中断——这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说，如果在一个经济独立性较强的先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情形又会如何呢？托洛茨基说过：“数国间的相互依存的有机关系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4页。

^②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77页。

朝着国际分工的方向发展，使得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①。然而，虽然“朝着国际分工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事实，但是既然它还尚未能臻于完善，不是就还不能排除经济上的独立性吗？

我认为，在这里应回顾一下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我所知，列宁没有象托洛茨基那样总地、绝对地否认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仅仅是认为，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是不完善的。一般说来，比起不可能说来，他更倾向于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观点。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不过，不可能说与不完善说没有多大实质上的差别，不必过于深究。现在要在细微末节上把这种区别确定下来，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如前所言，重要的倒是这个事实：在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上，列宁与托洛茨基毫无分歧，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众所周知，斯大林派伪造历史，曾竭力宣传列宁与托洛茨基间存在严重分歧。由于托洛茨基曾充分揭露了这种捏造，所以此处不再赘述。对下文的介绍只是为了揭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列宁的一贯思想。这是列宁在1905年末和1906年初写的遗稿。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把革命划分为几个阶段，指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他还对专政建立之后的特点做了如下描述：

“在第五时期所形成的关系的基础上，新的危机和新的斗争发展和加剧起来，这时无产阶级已经进行了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帮助，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正象1849—1850年的德国革

^①托洛茨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2页。

命党或者 1871 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一样。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

在这些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

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么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①

这里连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影子也没有（这篇遗稿由编者加米涅夫发表在 1926 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 5 卷上。据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派对列宁这篇文章的发表咬牙切齿，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份有利于联合反对派的资料。）¹

接下来再介绍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讲过的一、两段话：

“……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②

“……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经常强调，在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③※

对于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基本观点的说明就到此为止了。我曾经说过，不断革命论“是被不平衡发展规律、复合发展规律以及

①《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71 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8 卷，第 134 页。

③《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 25 卷，第 473—474 页。

※这段语录系译自作者引文。这段引文有错误。俄文原文应译为“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359 页），但在作者引文中却变成“我们经常强调，在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请读者注意——译者。

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所丰富的、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革命学说”。这也就是我以上说明的意义所在。如在本章下一节里将要论述到的那样，应该说，不断革命论发展、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是真正天才的设想。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下面就来谈谈这个应被称作不断革命论的第四个基本观点的农民问题。如前所述，这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战略论争的核心问题。托洛茨基否定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二阶段革命论的变形）的论据——前文曾引用过——有这样的背景：“飞跃阶段正好成为不平衡发展本身。”但直接导致托洛茨基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媒介，是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农民论上的分歧。现在来看一看，在前文曾介绍过的基本纲领中，托洛茨基是怎么说的：

“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种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能够组织起这样的农民党……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否则，托洛茨基就不必反对列宁的学说了。“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农民——引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这是1917年前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战略论的直接的、主要的论据。至少托洛茨基自己是这么看的。因此，应该从托洛茨基与列宁的战略论争的历史发展中，对此作出说明。

※“马克思主义不是国民经济各部分的统计，它是从强大的、作为独立的现实而存在的世界经济出发的。而世界经济则是由国际分工以及在我们的时代妄自尊大地统治着国内市场的世界市场创造出来的。”（《“不断革命论”德文版序言》《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49页）。

简而言之，列宁与托洛茨基在战略论上的分歧，即在承认还是否定“工农民主专政”上的分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¹⁾与农民的关系上，如何评价（作为整体的）农民的地位、作用，以及在何等程度上评价其地位、作用的意见分歧。在认为农民一般说来作用很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需要工农革命联盟这点上，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斯大林主义者一直宣传说，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这种宣传是捏造出来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对此有详细说明，在下一节里将谈到这方面的若干问题）。

对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中农民（指当时的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形之下，托洛茨基所作的评价要比列宁的低。因此，一方（列宁）认为，依靠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是体现了工农革命合作的“党的政策及国家形式”——应该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与此相反，另一方（托洛茨基）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应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而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856年4月16日）、德国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说：“德国革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①。而这也就是托洛茨基的革命公式。他本人在《不断革命论》中也谈到了这个意思^②。关于马克思的这段话，将在后面的论述中更详细地加以研究。如这里所说，实际上，托洛茨基的战略——起初并未意识到——意味着对马克思的上述战略的发展。

托洛茨基说：“列宁和我的争论实质上是针对着革命（资产阶

^①《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4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56、259、278页。

级革命)中农民的独立性(以及独立程度),特别是针对着建立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进行的。在这场争论中,我批评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批评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①

“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和“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的对立!那么,为什么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而列宁又“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呢?前面说过,这是因为,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农民所处的中间地位以及其社会构成是不同质的,所以它既不会有独立的政策,也不会有独立的党。在革命时期,它将被迫在资产阶级的政策与无产阶级的政策间做出抉择。”^②

无可否认,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确有这种倾向。在托洛茨基的多数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农民的这种性质的强调。在收入了其未完成的大作《斯大林》中的《俄国革命的三个概念》一文,也强调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程度。所以,在这里是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定论的。这需要具体情况下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封建、半封建的压迫程度,农民分化的发展程度,尤其是要对具体国家的全部阶级结构,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所谓“农业国家”以及具体的国际形势等作具体的分析;并依据这一切的程度和性质,来决定究竟采纳“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下一节将谈到,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的二阶段革命论的表述方式),还是采纳“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用“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一阶段革命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公式,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托洛茨基的战略一直被谴责为极左的、冒进的。但如果仅仅是由于飞越阶段的说法就遭到这种谴责,那么这种谴责就是庸俗进化论的作法。在历史上,“飞越阶段”是屡见不鲜的。“飞跃阶段恰好构成不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26页。

^②同上,第218页。

平衡发展本身”——见《不断革命论》第6章《飞跃历史阶段》)。

正如托洛茨基曾加以引用的那样，针对着托洛茨基对独立的农民革命党的否定，列宁曾著文反对。

在《革命和反革命》一文（1907年）中，列宁写道：“现在谁也不能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今后的命运如何。也许立宪民主党人的破产会有助于成立一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政党，即真正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象社会革命党那样终究只是一种恐怖分子的组织。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还有客观困难，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的民主派在长期中仍然象现在那样只是一种脆弱的、不定形的、软弱的劳动派群众”^①。在1919年写的一篇论文（《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中，他更加充满信心地倡导这种观点。他说：“俄国革命史中的事实表明，1905年年底高潮中的第一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的政治组织（全俄农民联合会）。在第一和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围内，即在全俄选举中）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雏形的‘劳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雏形中，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革命既然在开始时就使这种政治团体产生了，那么它在达到‘结局’，确切些说，也就是达到了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农民政党产生”^②。

在该文中，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了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说：“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也决不是以一般政党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同党的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

^①《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4页。

^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7页。

根本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建立农民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说，只有到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当时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所有这些组织大都是非党的，但是，这些组织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级的‘联合’。与此同时，农民党形成、产生和出现了——如1905年的‘农民联合会’和1906年的‘劳动党’——而且随着这个党的成长、发展和自决，阶级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从不明确的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议，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议。”^①

后来，针对着这种农民党的理论，托洛茨基指出：“这个假说被证实了吗？不，没有。可是，在历史能够提供完整、确凿的证据之前，这个假说却使列宁对革命政府问题作出了代数式的回答。”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上述战略论争，俄国革命的发展又作出了怎样的裁决呢？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应该附带谈一谈列宁的革命公式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公式。如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的第5章等处所说，“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不允许农民代表等加入这个政权。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工农民主专政”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究竟何在？问题就在于专政的领导权。托洛茨基强烈主张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决定性的领导权，所以他认为，不能允许无产阶级作为少数派加入这个政权。而列宁尽管

^①《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4—345页。

也强调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并不认为无产阶级不能作为少数派加入政权。这大概是由于他比托洛茨基更高地估价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在这一点上，列宁与托洛茨基是不同的。托洛茨基说：“列宁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允许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少数派参加民主主义政府。意见分歧仅在于此。”^①“这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但在本质上仍是农民的”^②。托尼·库里夫也说：“列宁所预见的，是工人党和农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是以农民党为多数派的‘工农民主专政’”。他接着解释道：“民主专政政权创建了共和国，剥夺了大地主，强制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在此之后，农民就将失去革命性，变成财产和社会现状的拥护者，与资产阶级携起手来。这时，与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结盟的工业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革命的反对派。这种暂时的‘民主专政’势将为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廓清道路”（此处需要注意下面这段话：“……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维持下去。这个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了列宁在1906年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发表的所有文章和演说〈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土地国有化问题等〉”^③。在列宁看来，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能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的。但是，没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民主的果实就不能维持和加强^④。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如果一定要就这些问题谈一点儿的话，那就要指出：在列宁的公式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处在萌芽阶段，这种领导权不可能、也决不会具有完全成熟的性质。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28页。

②托洛茨基《斯大林》日文版，第3卷，第678页。

③《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93页。

④请参考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一书，见该书日文版，第1卷，第132页。

如果能够使这种领导权具有成熟的性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它就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应该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了（“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合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①）。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俄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对这两者作出了怎样的裁决。

过去，我曾说过，“我倾向于列宁的意见”。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转而认为，二者都分别掌握着一部分真理——难道不是如此吗？

1917年4月，列宁对以加米涅夫为理论领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反对当时从战略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批判。这就是著名的《论策略书》。他在为时局下了定义，指出当时“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之后，这样写道：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

在1917年2——3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

①《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81页。

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的喧嚷：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认为只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已经提到日程上的已是一个新任务……

……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又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不要忘记，彼得堡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

的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①

尽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尽管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形式完善的工农民主专政并未实现，但列宁仍认为从战略上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归纳起来，这种认识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实际上，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普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这一个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②。列宁称这种局面为“两个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扫除了整个沙皇制度，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完全接近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民众力量的政权），就是工农阶级的专政。”^③

概括起来，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论的主张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设想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所谓“不同”是指，虽然“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④

那么，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列宁自认，他过去的观点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工农民主专政虽然“实现”了，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并做了“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或者说，建立起来的政权只不过是“接近于”这种专政。其实，《论策略书》中所批判的加

①《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4—25页。

②《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1页。

③《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9页。

④《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5页。

米涅夫等人的主张，基本上就是列宁过去的观点。列宁一直用这种观点来领导党，教育党，所以才出现加米涅夫那样的反对《四月提纲》的人。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他过去的“公式”只有一半是对的，并立即对这个公式做了修正。

这里附带谈谈列宁对自己提出的战略所做的修改。最初，列宁在提出其二阶段战略论时，并没有预见到民主革命会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才预见到这种将会迅速发生的转变^①。但尽管如此，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列宁还坚持这样的路线：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完成土地革命等，然后再转入下一阶段。出于前面说过的理由，《四月提纲》中则提出：尽管土地革命等尚未完成，在战略上也要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两个政权的局面即将结束时，列宁又变以往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为俄国先行论。这样，1905年革命后，列宁的战略出现了四次变化，逐步接近托洛茨基的战略。而另一方面，在组织理论上，托洛茨基也在向列宁靠拢。没有这两位伟人的接近与合作，大概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另一方，托洛茨基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不消说，前面介绍过的列宁的那些话他都很清楚。可尽管如此，对这种经过“修正”后建立的两个政权时代的工农民主专政，托洛茨基的评价却更低了。他把这种专政称为“发育不全物”、“退化器官”。《不断革命论》的第5章《‘民主专政’会在我国实现吗？如果能够，将在何时？》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对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话，托洛茨基大致上是这样理解的（托洛茨基没有引用、甚至无视前文介绍过的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这种作法使我为之一笑。这

^①《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1卷，第392—393页。

与托洛茨基对列宁对加米涅夫等人的批判的“有条件的反驳”有关)：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联合并不能建立真正的政权。而只不过可以形成一种不成熟的政权形式——它不是固定下来的事实，而只不过是一种趋势”^①。

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民主专政的观点与托洛茨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虽然有着微妙的不同，但这种专政即便是一种“不成熟的形式”也总不能不承认它。不言而喻，由此岂不是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也有一半是正确的吗？因为，托洛茨基的总理论甚至否定了、而且是一般地、绝对地否定了这种“半权力”的“不成熟的形式”。

因此，我认为，在上述问题上，俄国革命是沿着列宁战略与托洛茨基战略之间的道路发展的，所以他们二人各有其正确的地方。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一例外地、绝对地否定“工农民主专政”论是有些成问题的。但是，可以说，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国度，这即使是可能的，这种口号即使有一定意义，这种专政也很难成为固定的制度，它只可能是短暂的、过渡性的、插曲式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说：“在只是部分利益一致的两个阶级的政治同盟上是不可能建立专政的”^②——托洛茨基的话值得我们思考（本来，“工农民主专政”论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前者至少包括了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迅速转变的内容——一般说来差别不大。前者当然是彻底的二阶段战略论观点，可却不是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下一节里将会谈到，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德

①《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81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第323页及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上卷，第12页。

国革命时提出的战略。“工农民主专政”论虽然也是二阶段战略，但却是把这种战略发展到极限的一种变种。“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虽说是一阶段战略，但也不是标准的一阶段战略，而仅仅是跨出“工农民主专政”论一步的一阶段战略论的变形。因此，两者间的差异——的确有差异——不过是极其细微的（但是，岩田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在实践上与托洛茨基提出的由率领着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在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时代提出的联合反对派纲领中，在中国问题上采用了“工农民主专政”论^①。当然，这是出自季诺维也夫派的建议，仅仅是作为政治上的妥协，托洛茨基派才承认了它。虽然托洛茨基个人说他反对这种论点，但他毕竟没有公开抗议^②。不过，托洛茨基后来说过，没有公开抗议这一“原则妥协”是个错误。

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解说到此就该结束了。可是还必须就这一问题再说几句，这就是：实际上，在二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战略论争时，列宁没有看到过托洛茨基的最早概要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著作《总结与展望》。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谈到过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可信的。1919年《总结与展望》再版时，列宁读了这本书，他不是又重新评价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吗？托洛茨基的挚友阿朵尔夫·越飞的遗书就是这种推断的依据。1927年11月16日，这位高尚的革命家悲剧性地自杀了。在其遗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越飞和列宁在1919年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谈话一事。

“……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象我多次向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97页。《俄国真相》英文版，第148页。

^②H·阿依托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下卷，第388页。

您提到过的，我曾亲耳听到列宁承认，1905年时正确的是您，而不是他。临死的人不说谎，现在我再一次把这件事告诉您。”^①

越飞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和列宁的谈话不会是凭空捏造。托洛茨基本人也说过，1919年，列宁第一次读了《总结与展望》，并在这次谈话中“对不断革命论做了新的评价”。

大概确实如此。因为，事实上，第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说是托洛茨基首先提出的，列宁主张这种观点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第二、托洛茨基首先提出：仅仅推翻沙皇专制是不能完成土地革命的。土地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十月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列宁在提出《四月提纲》之前一直不这么看。“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下一节里还要谈到，最早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带到俄国来的光荣属于托洛茨基（但是与托洛茨基的预料相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半任务——推翻沙皇专制——还未等到无产阶级专政出现就完成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是不大愿意提起的）；第三、与列宁最初的预想相反，“工农民主专政”未能以完全的形式实现。

列宁无疑看到了这一事实，赞扬了托洛茨基。遗憾的是，越飞的遗书未能告诉我们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况。至于列宁在和越飞的谈话中是否认为他在1905年前后提出的二阶段革命论统统错了，我是取怀疑态度的。因为，如果列宁全面否定了自己，我们就该发现他的与二阶段革命论相反的论述。列宁是不会对此不置一辞的。

在另辟一节，进一步论述这些问题前，我还要再附带说上几句。在现代思潮社出版的译著《总结与展望》的说明的结尾处，我

^①《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卷，第964页、960页。引文根据俄文版作了一些订正。遗书全文见《俄国真相》英文版，第323—332页。

曾经写道，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才有可能完成”。这个观点虽然相当正确，但“对这种观点的过分夸大多少是叫人怀疑的”。我还举出列宁曾经指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差别作为我这种看法的理由^①。一些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读者就此向我提出了疑问。因此，我在这里要附带讲几句。实际上，当我发表上述意见时，我所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的中共革命。

如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所主张的，我否定了毛泽东的中共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也否定了中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我认为，毛泽东的中共革命只是一种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如果按托洛茨基的上述理论照本宣科，那么，既然事实上存在着包括农民革命在内的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革命又不可能存在，那就得承认连库西宁也不承认的、中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了（这并不仅仅因为我是绝对反对日共1932年纲领的。对库西宁这种人物不能多理会。托洛茨基等人对他的评价很低。但是，他在死前不久发表的批判中共的演说却值得一读。这就是他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批判中共的讲演。比起苏斯洛夫在这次会议上的批判演讲来，库西宁的讲演的确要高出一筹。那些蠢得无可救药的、希望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啊，拯救我们！）中出现进步的人需要先读读这篇演说，让头脑冷静下来^②。

库西宁在这篇讲演中批判道，毛泽东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

^①《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7卷，第83、84页。

^②这篇演讲载于刀江学院出版的《国际》杂志1964年9月号上。

论曾被共产国际批判过。他指出，毛泽东的“人民专政”论带有旧俄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的色彩。库西宁批判了毛泽东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的理论。他说，毛泽东的中共轻视工人阶级“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目前处于无权和贫困的境地的 事实。”结果是，中共“实际上不能称作是发挥了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的真正先锋。实际上，中国现在既没有任何人民专政，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既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也没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中国领导者们的一切假马克思主义言论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中国实际存在的专政的欺骗。这是领导者们的专政，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个人独裁”。这些话是正确的。既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中国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 10 章里，我对此已有论述）。不，不管库西宁是怎么否认的，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一定要承认！但是，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毛泽东的中共革命根本不依靠城市无产阶级（按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而主要靠的是农民军队（决不仅是农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承认中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一定需要城市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军就有可能进行、或者说是代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而提到的拙著（第 364 页—370 页）中批判了主张“代行”的多伊彻的错误理论。总之，如果这种主张能够成立，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就会完全被破坏！因为，《资本论》主张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托洛茨基的理论甚至否定了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独立作用或领导作用，更不用说那种认为农民军队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了。这是足以使托洛

茨基惊讶得瞠目结舌的理论(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中批判了农民主体革命论)！

我所想到的实际就是这些。与这种现实联系起来，我对过分夸大托洛茨基观点的作法提出了疑问。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被现实地创造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主义下却可以自发产生。可以说，经济基础在它的上面为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既成事实。由于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存在于资产阶级革命中，因此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虽然是相当正确的，但却不能过分夸大。需要对各种情况做具体分析。历史是相当古怪的东西，平庸的教条主义者在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3. 围绕“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与托洛茨基

其实，在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总结与展望》^①一书时，附在该书中的我的解说就已经包括了本章迄今所做的一些论述。以我现在的力量，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多的东西了^②。

但是，在出版《总结与展望》的同时，我所作的说明也遇到了来自该书“书评”的某些批评。例如，小山弘健先生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在解说中，对马先生纠正了斯大林历来对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对立之处的故意夸大，揭示了列宁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的基本问题（落后的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为世界革命的向往）上是完全一致的。他论证了，两人的分歧仅在‘农民论’上。”

^①该书由现代思潮社出版。

^②不过，我认为在该书第202页，第6—7行上，“有些倾向列宁的”这句话还是没有的好，所以在本章中删去了。

但是，他又说：

“我读了对马这篇文章后的感觉是：完全赞同他就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理论的歪曲所作的反证。但认为文章对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对立之处过于轻描淡写……我认为这是文章的不足之处。‘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思想。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各个错误’^①。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这个批评指出了从对农民评价的分歧出发而导致的在整个战略设想上的更加系统的对立。”“在这个对立的底部横亘着对农民的评价的鸿沟；列宁认为，彻底地汲取庞大的俄国农民的革命能量是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托洛茨基虽然谈到了‘落后的愚昧的农民大众’，但却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置一辞”^②。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再稍微深入一些地论述列宁和托洛茨基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对立”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我一直在想着小山先生的上述评论，所以这个论述也就成了对我的说明的补充（引文等与前面有某些重复，敬请原谅）。

首先，我想就“……托洛茨基……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置一辞”的评论谈点看法。这种评论完全是误解。1928年，托洛茨基针对着拉狄克写道，只要拉狄克读过曾在俄国出版的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我们的第一次革命》（2册）等书就会知道：

“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1905年发表的告农民书就是我写的。由列宁编辑的《新生活》在社论中坚决拥护了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关于不断革命的论文。列宁主办的《新生活》——有时是列宁个人——常常支持、拥护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而这些

^①《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4页。

^②日本《图书新闻》第897号。

决议是我起草的，而且这种会议十之八九都是由我来作报告人。1905年12月失败后，我在狱中写了论策略问题的小册子^①。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指出，无产阶级的进攻态势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结合是中心的战略问题。列宁让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通过科努扬茨向我转达了他由衷地赞许。列宁说过，我在1907年伦敦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自由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意见，与布尔什维克‘一致’。……”^②

我已经说过，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不承认农民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说法完全是误解。不但如此，下面这段话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在1907年伦敦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托洛茨基在一段针对着孟什维克的话里说道：

“……在我国，存在着数目庞大的农民革命群众，这是事实。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和我一样懂得：无论农民如何革命，它也不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更不要说政治领导作用了。毫无疑问，农民完全能够证明它对于革命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相信农民党能够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列，能够以自身的创造性将本国生产力从加在他们身上的古老桎梏下解放出来，那就不配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是城市，而只有城市才能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③

这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主张决不否认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农民既不能够起到“独立的政治作用”，更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归根结蒂只能由无产阶级的起决定作

^①《我们的策略》《托洛茨基全集》日文版，第2卷，第1分册。

^②《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91页。此外请看多伊彻的《武装的预言者》日译本，第129—130页。

^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集》引自《不断革命论》第4章。

用的领导、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是：“把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清算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的尖锐的社会冲突，把社会主义革命与对封建主义的清算结合起来”。前面说过，马克思在1856年4月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①。如托洛茨基自己所说，这也可以看作是托洛茨基的战略公式。

然而，1917年革命之前，在列宁的眼里，这个公式“……无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缺乏明确的看法。”后面将会谈到，二月革命前，列宁也没有采取马克思的战略——把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他把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应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托洛茨基根据他的独立的农民论，认为这种革命联合专政不可能存在。能够存在的，只有“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引用过：“从阶级内容上看，作为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制度，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种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全部现代史——特别是近二十五年来俄国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②

^①《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4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310页。

托洛茨基说：“列宁和我的争论实质上是针对着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独立性（以及独立程度），特别是针对着建立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进行的。在这场争论中，我批评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批评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①就是由于在农民论上的这种差异，出现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战略和托洛茨基的变相的一阶段革命战略，即进行伴随着执行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两种战略产生了对立。

差别仅仅是在这里。说到底，这正象托洛茨基所承认的那样：“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或在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围绕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程度（仅仅是程度！），存在着不同看法。”^②

所以，不能夸大这种差异。

但是，只要看看 1917 年列宁写的《四月提纲》和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人们就不能不认为差异不止于此。人们就会要说，这是“在整个战略设想上的更加系统的对立”，是两者间的“鸿沟”。然而问题是，在今天读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托洛茨基战略的批判，需要打相当大的折扣。这样说有两、三点理由。

第一、1917 年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之所以很激烈，实际上与其说是因为战略论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基于组织论上的对立。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当时他错误地相信孟什维克会成长为左翼，站在了两派间的所谓“调和主义”的立场上。他说：“我的调和主义是出自一种社会革命的宿命论。我相信阶级斗争的逻辑将使两派都不得不同一条革命路线。”而这种态度在列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 3 卷，第 226 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 5 卷，第 281 页。

宁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就不会不影响到两者间的争论。

第二、在这一时期，列宁对不断革命论的片断评论不仅受到了上述组织论上的对立的影响，而且如前文所说，实际上，由于列宁是在还未读过最早归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总结与展望》一书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所以他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出于误解，这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列宁没有读过《总结与展望》的情况，请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89—190页、247页、331—332页）。据托洛茨基说，列宁几乎完全是根据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写的序、托洛茨基事先一无所知的帕尔乌斯的话：“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1905年）以及马尔托夫论文中的片断引文等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顺便指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常被宣传为托洛茨基的发明，甚至连列宁也这样说^①，但这完全是捕风捉影。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托洛茨基说过：“不要沙皇，也不要地主，而要人民”**，可在内容上，这两句话是迥然不同的。托洛茨基为此做了各种解释。他说：“到现在为止，在任何场合下我都未曾说过、写过、提到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他还指出：“帕尔乌斯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见解与我的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②。

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因而也是要加以说明的一点。这就是：事实上，在发表《四月提纲》之后，列宁的见解（包括农民论）逐渐接近了托洛茨基的看法，他们的距离大大缩小了。托洛茨基说：“应当完整地理解列宁。特别是应该把从更高的着眼点观察和评价形势的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考虑在内。”

*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译注。

** 不要沙皇，也不要地主，而要人民。

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24页。

②请参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12—213页及250—251页。

实际上，这种思想正是为研究“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必不可少的。倘若缺乏这种思想，人们就很容易上斯大林主义者搞的“托洛茨基批判”的蛊惑宣传的当。

那么，距离是怎么缩小的呢？

第一、诚然，列宁在1917年4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开始，就是谁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马克思说过（实际是恩格斯——引者），法国开始，德国完成，但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①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前，列宁是主张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的。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跟在西欧革命之后。在俄国的革命家里，只有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根据历史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从1905年前后起就一直主张：俄国有可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在发表《四月提纲》之前，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战略论是这样一条路线，即首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彻底完成土地革命等，在此基础上再转入下一阶段。但是，由于我在上一节里已说明过的理由，在土地革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列宁就作出了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决定。所以，这之后的战略方式就成了把农民的土地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战略方式。事实上，十月革命——在另一方面兼有以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自身成败条件的特点——就是具有这种特点的革命。这种战略恰恰是托洛茨基自1904——1906年以来就一直主张的战略。这样，两者间的距离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两者由于农民论的分歧而在赞成还是否定工农民主专

^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17页。

政论上形成的不同见解又变得怎么样了呢？

托洛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到1917年间的全部经验，使它对‘民主专政’紧闭大门。列宁亲手在门上写了告示：禁止通行。列宁还用下面的话使这种经验理论化。这就是：农民或者跟资产阶级一道走，或者跟无产阶级一道走。”^①

确实如托洛茨基这里所说的，列宁极力主张这种强调否定农民独立性的农民论。这是个事实，应给予注意。

例如，列宁说：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②

“零星散漫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中，在新时代的各次革命中历来就是这样，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来还会永远这样），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在新时代某些最伟大的革命高潮中有过这种时间极短的萌芽状态的联合；在1917年至1921年间的俄国，有过这种形态更为发展的联合）。只有妄自尊大的倨傲之徒才能空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③

如我们所读到的，这里主张的是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并无二致的农民论。但是，倘若如此，就应象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样，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紧闭大门”吗？对此，我是有些怀疑的。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67、282页。

②《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30、333页。

③《论粮食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52页。

虽然由于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等，列宁感到这种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发育不全”的性质，但毕竟没有全盘否定它，难道不是如此吗？

据我了解，这是因为，在对4月以前进行回顾时，列宁并没有自我否定过他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非但如此，毋宁说，当人们读到《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18年)、《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著作时，感觉会恰恰与此相反。在这些文章里，列宁并未做任何自我批评，照抄了他过去写的、主张二阶段革命论的各种文献。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字句。列宁有意以此表示了由复数的阶级组成的专政的存在。列宁写于1919年4月中旬、发表于《共产国际》创刊号上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托洛茨基称之为“纲领性文献”)中也认为，十月革命“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同时，文章没有对此做任何批评就接下去写道：“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丝毫也未对这些思想加以否定**。

*在这次革命中，工农民主专政未能以完全的形式实现。在列宁看来，它不过是作为一种不成熟的“半政权”，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修正才实现的——引者。

**在文章中，列宁列举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在1856年论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

我觉得列宁的这篇文章颇为费解。因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并不包含“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结合”的公式(这是托洛茨基的战略公式)，而是与这一公式相反，在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中，“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就已解决了的。所以，倘若硬要把列宁的这篇文章视为合理的，那就只能象托洛茨基所说的：“农民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这意味着，‘工农民主专政’只能理解为由无产阶级统率着站在其身后的农民的专政。”应该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是讲得通的。但是，我之所以感到列宁的这篇文章费解正是因为，“从1905年初起”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与这种理解不是一回事——作者。

那么；列宁是直到去世都确信他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是完全正确的吗？

不，这也是有疑问的。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由于有二月革命“修正”地实现的经验等，列宁已不象发表《四月提纲》前那样确信其战略的正确了。虽然还不至于全盘否定，但他却愈益感到，他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发育不全”的性质。

就我所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如我在上文中所推断出的第一个理由指出的那样，列宁在农民论上与托洛茨基一致起来，并且与托洛茨基一样，强调否定农民的独立性。其次就是我在下节结尾处提到的越飞的遗书。象已多次说过的那样，我想重申这份遗书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我说过，列宁在没有读过《总结与展望》的情况下就对托洛茨基的战略进行了一些片断的批判。1919年《总结与展望》再版时，列宁不是才第一次读了这本书吗？这时，列宁在与越飞交谈时提到了不断革命论。我们可以推断，列宁对不断革命论重新做了评价。越飞在悲剧性地自杀之前，在给托洛茨基的一段遗书里写道：

“……从‘不断革命论’问世后，我就和您站在了一起……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就象我多次向您说过的，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就是在1905年时正确的也不是他，而是您。人临死是不说谎的，我现在再次把这件事告诉您。”

越飞生前就曾打算公布这次谈话，但似乎是因为托洛茨基担心越飞受到迫害，制止了他这样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次谈话的详情未能传下来，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托洛茨基写道：

“阿·阿·越飞说过，列宁承认我的预见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来说，这是不易理解的；而另一方面，所有联系到革命发展本身而深思熟虑地思考

了列宁思想发展的人都会懂得，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从未仔细研究过我的整个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他根据孤立的引文，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显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看法。现在则与过去不同，列宁重新评价了不断革命论。他没有搞错。”^①

我相信，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值得充分注意。我已经说过，下一节里还要再谈到，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用于俄国的光荣就属于托洛茨基。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则与马克思的这一见解背道而驰。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说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列宁主张这一观点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与越飞交谈时，列宁无疑想到了这一事实，想到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二月革命中做了修正，而且实现的仅仅是不成熟的半权力状态。

但是，由于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理由，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他过去的主张，我是抱有疑问的。然而，列宁不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以往的战略公式，这恐怕倒是事实。上文已经介绍过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农民论就暗示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他就不会说“即使在1905年……”的话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一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事实上，身为共产国际领袖的列宁一次也未就落后国家的革命论述“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专门谈论落后国家革命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也对此一字不提（虽然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提纲里有关于“农民苏维埃”或“工人苏维埃”的建议，但却未说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到了斯大林、布哈林时代，第三国际又把它拿了出来！）。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31—332页。

我尽管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工农民主专政论抱有疑问，但却不认为列宁已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正确，不轻易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可见，只要把十月革命后包括在内，全面进行评价，那么所谓列宁的战略与托洛茨基的战略间存在着“鸿沟”、存在着“牵涉到全局的更加系统的对立”的说法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诚然，在《四月提纲》发表前，这两种战略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在消失，或者说，两种战略的距离大大缩小了。如果还存在着那种有关战略论的系统性的对立，那么下文所介绍的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就绝对无法理解了。

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人要求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组成联合政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里亚扎诺夫、米留金等)，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决反对，但是在1917年11月1日(新历14日)召开的彼得格勒的党委会还是讨论了这个问题。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在会上相当谨慎地暗示了“托洛茨基主义”。列宁是如何回答的呢？

“协定？我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来谈谈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一致是不可能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而从那时以来，再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

托洛茨基在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话后写道：“在列宁看来，使我与布尔什维克分手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为了作一

* 顺便指出，在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由于斯大林的特别命令，列宁的这篇讲演在出版的过程中被撤销了，一直隐埋至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溢美之词使斯大林感到难堪。不过，在1931年用俄文出版，1937年译为英文的托洛茨基著作《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斯大林伪造学派——译注)中，附有上述讲演内容的校样的照相版，并收入了这篇讲演的全文。此书的日译本将于近期出版——引者。

名‘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须懂得，与孟什维克缔结协定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就是如此。列宁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如果列宁与托洛茨基间存在着关于战略论的系统对立，那么列宁怎么会用“从那时以来，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的话来赞扬托洛茨基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斯大林在1926年说：“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①

托洛茨基嘲笑了这个评语。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斯大林的这段话一文不值，完全是面壁虚构，是谎话。我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事实正好与斯大林的话相反。实际情况是，在《四月提纲》提出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虽然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有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消失，或者说大大缩小了。“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对此也许很难置信，可只有它才是事实。

然而，在作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特别是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存在对立吗？

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对立——我在上文已讲到这一点。特别是，在落后国家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小山弘健先生也表示同意。所以也许不用着意下一番笔墨了。不过，既然有人至今还对斯大林所谓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神话深信不疑，所以尽管有画蛇添足之虞，我在下面还是引用斯大林和列宁的话来做一个对比。首先是斯大林：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

^①《“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01页。

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①

要是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孟什维主义的……普通的理论”，那么列宁也就成了孟什维克了！请看：

“……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②

这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演说。据托洛茨基说，这次大会上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

4.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发展

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做的上述解说，到这里就大致结束。不过，还有一个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关系问题。如最初曾说过的，托洛茨基的革命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运用和扩大”。在这一节里，我准备稍微深入地对此加以说明。

使我感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有深厚继承关系的有两点。托洛茨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自命，有这

^①《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8页。

^②《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种关系并不奇怪，但它特别体现在两点上（不言而喻，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出色学生。不过在我看来，列宁如果是师兄，托洛茨基就是师弟）。

先从第一点谈起。前文说过，托洛茨基的革命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为一个阶段。但我已几次提到，这一思想的原型是出自马克思。即马克思在1856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思想的原型。托洛茨基的战略就是对它的发展。可以说，这一点是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了的。当然，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在维也纳时才读到了收入这封信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在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时，他还没有直接读到过这段话。尽管如此，回过头来看，我们仍然可以说，托洛茨基战略思想特点的原型出自马克思，托洛茨基的战略是对这一原型的发展。

当反驳拉狄克在对比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时提出的某些见解时，托洛茨基说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话：

“然而，拉狄克甚至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的观点。他只是蜷居屋中翻了翻马克思1850年写的那篇还把农民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的文章（《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当时，马克思期待着出现一个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由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急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这才是问题的要点！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1856年4月16日——也就是上面说的那篇文章发表6年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提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

太好了。’

拉狄克把这些应该注意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虽然就整体来说，这些话已经真正成为解决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此所涉及到的全部问题的宝贵钥匙。马克思超越了土地革命吗？不，没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在必将到来的革命中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吗？是的，他认为需要；马克思承认农民有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或至少起独立作用的可能性吗？不，他不承认。马克思是从下述事实出发的：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不是由于农民、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缺点）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将站在支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显然，拉狄克不愿意看到，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还不算坏。”^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848年的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与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这场变革是在欧洲文明普遍更发达的情况下，由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曲”^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革命是一场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发生。这可以说是属于二阶段战略论范畴的观点，是最典型的二阶段革命论。《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77—278页。

^②《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

级本身的斗争”^①（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都提出了内容相同的主张）。

但是，1848年3月革命开始后，德国资产阶级的行为不仅没有比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更革命，而且明显是背叛。德国资产阶级与自己的真正敌人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实行了反革命的妥协。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等报刊上写的许多文章都对之进行了揭露、批判。德国资产阶级还背叛了它的“天然同盟者”——农民。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大陆的这场革命“在巴黎有1849年的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山岳党的镇压），在德国有5月起义的失败（5月——7月的护宪战役），加上俄国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1848年革命的伟大时期宣告结束。”（恩格斯语）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失败，不久会再次掀起革命的浪潮。而众所周知，他们是在1850年9月前后改变了这种看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时与空想的极左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分手）。但在改变这种认识前不久的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为德国革命将再度来临。如托洛茨基所说，他们“期待着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受到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爆发。在此意义上，如本章第1节所介绍的，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不断革命”一词，但仍然保持了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就是说，虽然由于同法国工人的胜利合拍而得到极大推动，德国工人不经过充分的、长期的革命发展就不能掌握统治权）。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

^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

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文章中认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以这种统治是必不可免的为前提，文中详细谈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对策。不言而喻，文章中估计到，在这种情况下，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会充当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扮演的叛徒角色，所以论述了针对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采取的对策。文章中说，虽然还不能完全否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暂时结成的联合战线，但在这场革命中贯彻始终的，是确保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以及同它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的必要，是坚持工人的彻底武装及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文章中指出：“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提出了“双重统治”的要求。文中强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暂时统治不可避免，所以在它们取得胜利后，“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提出的那些乍看起来很激进的措施。但是，需要要求更激进的措施，需要进行斗争，尽可能早地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垮台，为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做好准备^①。

据里亚扎诺夫说，“列宁熟记此文并喜欢引用它”。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恐怕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很大影响。当然，这两者还不是一回事。普列汉诺夫就曾用这篇文章抨击过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篇文章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建立暂时统治，主

^①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1—298页。

张无产阶级政党应作为“极端反对派”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这种统治采取行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则没有提出过这种主张。但尽管如此，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却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独立性，强调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妥协态度，并进而考虑到了革命时期的“双重统治”的要求等，由此说来，比起《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提出的建立在革命时期与公认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府并立的“革命工人政府”的主张来，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不是要更进一步吗？

但是，与列宁的战略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当时认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出卖了它的“骨肉”、“天然同盟者”农民，但农民还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盟者，“工人应该象民主派同农民结合那样地去同农村无产阶级结合”。然而列宁认为，不仅农村无产阶级，而且全体农民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是他的“工农民主专政”论的重要基础。

两者间的区别的产生是由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能力的评价不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能力，而在二十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里，列宁对它们则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恩格斯在《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中写道：“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①资产阶级革命越是属于资产阶级担负领导作用的古典

^①马克思《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1页。

的典型，农民就越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不用说自由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辜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里亚扎诺夫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期望——当然，在宣言中他也提出了为实际实现合作所必需的许多前提条件——落了空。”^①这不仅是指自由资产阶级，也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前面曾引用过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中所说：“……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

托洛茨基说，汲取了这一教训的结果是：“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前面说过，到1850年3月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就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革命提出的革命战略还属于所谓二阶段战略论的范畴。但是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所设想的却是一阶段战略论——这个周密地说应称为二阶段战略论的变种的理论了。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还是从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来考虑“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的，所以文中的“不断革命”一词仍然带有二阶段革命论的意义。而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发展了“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使它具有了压缩、合并两个阶段的意义。

列宁在1905年曾经说过：“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

^①里亚扎诺夫《马克思、恩格斯传》。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①这里所说的“不断革命”，当然还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的二阶段意义上的不断革命。但是托洛茨基说的不断革命与此不同，它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之后的发展了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列宁在1914年下半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里，也引用了前面曾引用的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的话，但是仅仅把它说成是“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一直到二月革命前，列宁也没有提出过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合为一体的战略形式。上一节说过，在191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列宁说：“马克思1856年在谈到普鲁士时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但是，在二月革命前，他却并没有考虑过这种结合形式）。

当然，马克思的带有这种倾向的思想不是在1856年突然产生的，马克思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1852年）一文里已经有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文中写道：“只要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复兴尚未绝望，只要他们还未摆脱对小块土地的迷恋，只要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的全部国家组织尚未解体，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农民国度的独唱将只能得到挽歌式的合唱”^②（当然，在1869年出版的该书第2版中，马克思亲自删去了这句话之前的某些话，而代之以其他句子。但在这段中稍前一些地方的话保留了下来：“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

^①《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21页。

^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马克思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200页。

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总之，列宁提出的是作为二阶段战略论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样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论点；马克思提出的不是这种二阶段革命论的变种，他提出了另外的、即作为一阶段革命论变种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战争）被无产阶级革命一气呵成地结合的革命公式。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战略的原型。当然，托洛茨基的战略并不是直接从马克思的这一原型中得到启示而创造出来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这两者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

为什么列宁没有一鼓作气，提出这个革命公式呢？为什么他只停留在“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公式上了呢？——虽然由于1905年到1917年的俄国与1848年到1850年的德国的阶级斗争条件有着不同的历史，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从中受到莫大启示的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观点来还是进了一步。恐怕可以说，这是由于沙皇俄国这个巨大的农民国家的重负感使然。前面说过，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但正是这种重负感使列宁提出了不同于他们的二阶段战略、而是这种战略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并停留在这种论点上。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到二月革命为止，列宁也不知道在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发表以后马克思提出的将资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战略设想，而这大概也助长了这种情况。或许列宁受到了1850年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二阶段革命论的强烈影响。总之，列宁的战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战略的直接发展。托洛茨基不是从提出二阶段战略论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虽然从中得到了“不断革命”的用语——出发的，而是从马克思在这篇文章后提出的新观点出发的。更确切地说就是：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的战略与马克思的

一致，并使之取得了发展。师兄从老地方起步，师弟从新地方出发！我就是这样看的（在岩田弘的《什么是革命纲领》^①中的〈1848年革命与马克思的革命计划〉中说，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二阶段战略论，排除了这种看法。倘若岩田弘这么认为，那显然是误解。恰恰相反，到1850年发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革命论明显是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最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一革命论认为革命首先建立起来的政权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是“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或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不可避免的暂时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下一个阶段。在本文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是以这种二阶段革命论为根本的，是它的变种、发展。

在同一论文里，作者还说：“以二阶段革命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而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过渡、并进而使这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化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容”。作者大错特错了。这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前的观点，决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下面转到第二个问题。它也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命题有关。

在整个第二国际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将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开始，落后国家跟在后面的观点基本上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普遍看法（我已指出，直到二月革命时连列宁也未能免受这种普遍认识的影响）。面自1905年革命时起，托洛茨基就反对这种普遍看法，力陈在落后国家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同时他还强调，虽然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革

^①《什么是革命纲领》日本《马克思主义战线》杂志1965年6月号。

命继之发生，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支持，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失败。这就是否定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后来根据历史不平衡发展规律做了说明。为什么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这种革命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会失败？托洛茨基说，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这种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这些我在上文中已经做了说明。

托洛茨基的这些思想本身实际上与马克思有着很深的联系，也可以说，他的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学说的天才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

上文中还未更多地谈到这个问题。具体地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究竟是什么？上文中谈到的恩格斯的意见已稍稍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论述可能是第二国际时代的普遍看法的根源。他说：“……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①

当然，在这一段的前后，恩格斯还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与第二国际的思想是决不一样的。但尽管如此，这段引文否定了落后国家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可能给人们，至少也是容易给人们以这样一种观念：革命通常总

^①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1页。

是从先进国家开始（恩格斯在引文中所讲的“同时”不应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时，而是在一定期间大体上“同时”，或者也可把它看作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

但是，恩格斯后来修正了革命在先进国家英国“最快最容易”发生的说法。因为自1858年以来，恩格斯注意到了英国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工人贵族问题，指出了它的出现给英国革命造成的困难。结果，他否定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设想社会革命由“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①恩格斯是在1894年6月2日给拉法格的信中表述了这一思想的。甚至在这之前的1887年，恩格斯就说过同样的话：“因此，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②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也对此作了摘要。

可见，恩格斯也开始设想革命不一定从先进国家开始。那么，马克思如何呢？下面按年代先后引用马克思的两、三篇文章。不幸这些话历来不大为人所注意，其实这里面包括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精髓。

“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中风浪……”

因此，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

^①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6月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246页。

^②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1页。

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①

“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使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②

以上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时的见解。大约过了二十年，在写了《资本论》后，他的这种见解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马克思说：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

^①《革命运动》《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75页。

^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4页。

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①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②

读了马克思的上述文章，最强烈的感觉有两点。第一，众所周知，英国在当时是资本最发达的国家，《资本论》也主要取材于英国。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革命将从英国开始。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将从比英国落后的大陆各国、特别是法国开始。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论述^③：“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实际上，在马克思刚刚写下了“……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后不久，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

第二，尽管如此，英国毕竟是当时资本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如果危机首先在

①《机密通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72页。

②《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56页。

③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3页。

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因为，“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作是资本的首都”。

我认为，上述两点包含了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精髓。诚然，考茨基、布哈林等人说过，马克思的预见没有言中。托洛茨基也说过，“马克思有先见之明，往往把临近的革命看得比实际更近”，但这对革命家来说未必是不光彩的（托洛茨基接着说，“革命在他面前发生时却迎头错过，或革命过去后还硬要把革命的尾声说成是革命的序曲”才是不光彩的）。

然而，比马克思所预测的革命速度正确与否要远为重要的，是包含在上述两点中的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本身。因为在这种思想方法中包含了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不管他是否注意到上面介绍的马克思的文章——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的进一步发展，至少也同这一学说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是这一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我在前而已经说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早就主张，落后国家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这一学说还认为，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继之发生，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遭到失败，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的直接继承者，是这一学说的发展呢？这要稍微做一些说明。

托洛茨基说：“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前面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落后国家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与第二国际中的普遍看法是不同的。但是，唯物史观的公式指出：“社会的

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乍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更接近社会革命，革命将会从这些国家开始。事实上，考茨基及普列汉诺夫的十月革命为时尚早的观点，就是来自这种认识。但是他们的这种观点是相当肤浅的解释，是不得当的。因为唯物史观的这个公式适用于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决不适用于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无视历史不平衡发展规律，就不会运用这个公式^①。

前面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心脏”和“四肢”的关系的论述。托洛茨基的下述名言也曾被多次引用：

“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成长，变得更强大有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不是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要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关系和国际情况，并最终取决于若干主体性因素，即传统、工人的斗争主动性及斗争准备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依赖于技术发展和国家资源是荒谬的、是单纯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②

“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其集中程度、文化以及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无疑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但是这种依赖不是直接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时期，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与该国各阶级

^①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178—179页。

^②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1—62页。

的政治力量之间都夹杂着各种国际、国内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有时替代了经济关系的政治表现，有时甚至完全改变了它。”^①

托洛茨基在谈到第二次中国革命* 的失败时说：

“……现实问题不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否成熟。这个问题可以还原为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是否成熟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同。如果没有不平衡发展规律，也许可以把它等量齐观。但不平衡发展规律恰恰寓于这个问题之中，它是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完全适应的。”^②

但是，尽管如此，没有“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的国家”（越是先进国家越成熟）的革命随之发生，先行一步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马克思说，没有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参加，“整个欧洲大陆……的变革”“都不过是杯中风浪”，“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或者如托洛茨基所说：“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将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专政。”“如果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俄国工人阶级在农民背弃他们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压垮。除了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命运，从而也就是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外，俄国工人阶级别无选择。”^③

因此，二月革命时才总算转到了俄国革命先行说上的列宁才这样说：“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

①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5页。

* 指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译注。

②《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05页。

**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8章的论述。

③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28、144页。

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①

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旦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这些就一目了然。唯物史观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那个率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落后国家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达到了上述水平。虽然由于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这个国家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却不能说它在经济上已达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了”的国家的水平。马克思说：“社会劳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是它的历史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不知不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②可见这个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还未达到这种成熟程度。问题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托洛茨基的下述言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为满足人类需要，社会主义要有计划地、协调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实现它的合法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脱离实质上是世界性的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是过分狭小的各个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域。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时，想到的不仅仅是所谓干涉这样一个机械的、孤立的问题，而是把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全面综合起来加以考虑的。”^③

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②《资本论》日本岩波文库版，第9分册，第84页。

③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23页。

由于上述原因，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比先进国家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尽管如此，前者却要比后者晚到达社会主义。权力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力，但是它却不能任意建立起经济秩序。这是暴力论（关于暴力论，请参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我多次讲过，斯大林之流的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与这种暴力论相似的理论。它恰恰合乎权力主义者斯大林的胃口。但是人们必须考虑，为什么马克思为了建立新社会是如此地重视先进国家英国。必须考虑马克思说的没有英国参加的社会革命是“杯中风浪”这种态度本身。

还要附带说一下，虽然我们说落后国家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这在某些方面是有一定限度的。第一、完全是可能性的问题。不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普遍的、必然的。第二、就是落后国家，也要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在这种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这点上，应该注意不久前翻译出版的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所作的评论。由于我在本书前面的解说中已谈到过，这里就从略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托洛茨基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随之产生，而遭到了失败。因此，问题当然就不能不是，在革命俄国是否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属于苏联论的问题，所以挪到下一章——托洛茨基的苏联论中去谈。托洛茨基认为，列宁去世后的共产国际对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因此，这也是一个问题，在苏联论结束后，我准备就这个问题简单地做一个说明。

* 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人民出版社版，第59——60页。

第三章 论 苏 联

1. 苏维埃的热月与“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在挪威的流亡地，托洛茨基写下了有名的著作《被出卖的革命》（1936年），对他的苏联观做了系统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我国曾出版过这部书的译本，但由于那是向斯大林一边倒的时代，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又毫不理解，所以这部书几乎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断革命论、特别是在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苏联论的前提和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将不可避免地预见到，西欧各先进国家的社会革命的挫折，不能不引起革命俄国本身的某些倒退性变化。

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①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这种“向后作巨大的跳跃”是不可避免的。在前一章里曾引用过托洛茨基的这样一段话，他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加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托洛茨基把这种“危险”看作是什么？又如何估价这种“危险”的程度呢？

我准备从托洛茨基的苏联论的各种主张里摘出以下几条，把它大致综合起来叙述：

^①《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03页。

一、不仅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出现热月时代；

二、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但“蜕化的工人国家”不是长期的存在物，而是“插曲式的倒退”；

三、即使苏联“蜕化”了，只要它还是工人国家，就应该无条件地拥护它。但这决不是拥护斯大林主义官僚，而是要求打倒他们，依靠人民武装起义，发动革命打倒他们。“第四国际认为，必须通过劳动人民的革命起义手段打倒官僚”^①，这是“第二次补充性革命”，没有这场“政治革命”，俄国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四、在反对把苏联看作官僚集产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时，托洛茨基提出的论点，特别是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除去把“插曲式的倒退”的观点挪到最后外，准备大体按以上顺序进行批判性的解说（我建议读者看一看托洛茨基写的《被出卖的革命》以及《托洛茨基选集》第9卷中有关苏联的论述。详细阐述此处从略。这里谈到的只是几个最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1928年12月，在被驱逐出国的前夕，托洛茨基写信给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写道：“理论演绎和政治经验证明，历史反作用、否定、即反动时代，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也有可能产生。在苏联，在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加大的条件下，在结果是为热月清扫了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已经生活了六年。这种反动在党内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现，就是对左派的野蛮驱逐、迫害以及对左派组织的破坏。”^②

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和山岳党人被保守派推翻的日子是法国革命历经的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热月即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5页。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涯》日文版，第2卷，第1005—1006页。

由此得名。它一般是指对革命的反动或反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热月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仅仅进行一次是不能达到所期目的的，补充它、完善它的革命可能会屡次发生，在这期间，在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和第二个高潮之间，就可能出现热月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也就存在着同样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看来，只要革命不一定从资本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只要落后国家先进行革命，只要其他国家，特别是各先进国家不紧紧跟上，无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热月的可能性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前文介绍，列宁也曾说过：“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①因此他在理论上也考虑到了热月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站在斯大林等人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就不会在理论上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考虑这种可能性，也只是在国外进行军事颠覆的情况下）。

但是，托洛茨基虽然指出了，在自己这一派以及自己这一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加米涅夫派的联盟遭到镇压后，苏联存在着走向热月的危险，然而当时他认为这只是趋势，反对把热月看作苏联的既成事实。例如，对于广义的左翼反对派中的一支“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等人）以及德国的左翼反对派胡戈·乌尔邦斯等人提出的这种主张，托洛茨基就曾表示过强烈的反对。从1935年前后开始，托洛茨基才逐渐认识到，自1924年列宁逝世后起，热月就已经是苏联的既成事实了。他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国大革命的热月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它已经远远在我们的后面了。”“1924年——这

^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就是苏维埃热月的开始。”^①

我也认为，西欧各先进国家革命的挫折是产生苏维埃热月的主要客观条件。加上与此有关的、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由于采取了笨拙的策略而被斯大林派击败这一主观条件，苏维埃热月不幸是不可避免了。然而，所谓“热月”究竟是什么呢？在反对把苏维埃热月视为苏联的既成事实的观点时，托洛茨基下了这样的定义：

“热月并不意味着一般的反动，即不意味着革命阵营的 后 退和衰败时期。这个词有着远为严格的意义。它标志着政权转到了其他阶级的手里，在此之后，革命阶级不凭借武装起义就不能恢复自己的政权。”“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时，热月标志着，政权从无产阶级手里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此外别无其他意义。如果热月完成，俄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②

在下了这样的定义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俄国的“蜕化”迄今尚未完成，因此，“一如既往，俄国反对派根据这一基本事实采取的政策不应是革命，而是改良。”^③然而，1935年前后，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根据有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采取的政策在德国造成惨败后，托洛茨基开始认识到，自列宁逝世后，苏维埃热月就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他开始主张在苏联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而不是改良。但是，这场“革命”只是一场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的“政治革命”，而决不是以根本变革社会经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5、116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29、42页。

③同上，第31页。

* 作者说，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指三十年代前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的一种理论和策略。其中心内容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双生子。社会民主主义应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打击对象。那种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的观点是对工人的欺骗。作者认为，这种主张直接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详见本书第4章《对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及第四国际》——译者。

济组织为目的的“社会革命”^①。托洛茨基对与之意见相左的马克思·夏哈托曼说：“如果苏联已根本不再是工人国家，那么，要求进行的就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了。”但是，由于后面要谈到的理由，托洛茨基认为苏联还是“工人国家”，他要求进行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因此，他提出的口号是：彻底“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无条件捍卫苏联”。

但是，从以前（1929年）所作的“如果热月完成，俄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的定义看，这个口号岂不是矛盾的吗？不，并不矛盾。因为到了这个时候（1935年），托洛茨基已经改变了热月的含义。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道：

“……回过头来看一看热月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主张，在苏联，热月不过是正在酝酿，还没有完成。此后，由于要给同热月所作的对比以更加正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性质，我们得出了热月早已发生了的结论。虽然这样公开地修正了自己的错误，但我们的队伍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动摇。”^②这就是说，1929年的定义是错误的。那么，经过修正的新定义是什么呢？1935年，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今日苏联——工人国家与热月以及波拿巴主义的问题》）中写道：

“1794年的热月使政权从国民公会的一个集团手里转到了另一个集团的手里，从一部分胜利了的人民的手中转到其他阶层手中。热月是反革命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赋予反革命这一概念以多么广泛的意义。1789——1793年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从本质上说，它是要以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取代固定的封建财产。与这种革命相应的反革命，应该是重新恢复封建财产。但是，热月没有

^①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76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7页。

作这方面的尝试。罗伯斯庇尔在职员中寻找支持，政府求助于中产阶级，波拿巴则与银行结盟。然而，这些变化……完全是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热月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热月9日的政变没有清算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但是它却把权力转移到了更稳健更保守的雅各宾党、转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更富裕的分子的手里。今天，苏维埃革命也在向右转。虽然比起热月来，它采取了更缓慢、更隐蔽的形式。不可忽视的是，与此、即与热月完全相似的过渡，很早就产生了。……就社会而言，无产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是更加划一的。但是，它的内部也有许多阶层。取得政权后，在官僚以及与官僚结为一体的工人贵族开始形成的整个时期，这一点极其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左翼反对派的被粉碎，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明，政权从革命先锋手里，转到了更保守的官僚分子和工人阶级上层手里。1924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开始。”①

这就是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决没有“清算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它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那么，它虽然是“反动”的，但却根本不是“反革命”的吗？

托洛茨基的这个新见解忘记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不同。我不能赞同这种错误的类比。这一点放在后面谈。总之，托洛茨基根据这一思想，于翌年写了《被出卖的革命》一书，提出了苏联是“蜕化了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这部书脱稿于1936年8月，即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清洗审判的前夜。托洛茨基说：“历史还没有决定苏联的性质”。直到1940年8月21日被格伯乌的走狗杰克·摩尔纳尔（加泰罗尼亚人拉蒙·梅尔卡德尔）暗杀前，他曾执着地、反复地谈到过这一点。可以说，“苏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97、104—105页。

联的现存政治体制是比总统时代更接近帝政时代的‘苏维埃’（或反苏维埃）的波拿巴体制。但就其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趋势而言，苏联今天仍然是工人国家”^①。

托洛茨基起草的第四国际的纲领（1938年9月）中写道：“苏联是从十月革命中产生的工人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开创了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工人国家的机构却完全蜕化了。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官僚对工人阶级施加暴虐的武器，并愈益成为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武器。落后的、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转化为无所不能的特权阶层，现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成为对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的最有力的反驳。因此，苏联虽然呈现出可怕的矛盾，但它仍然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这是社会的诊断。政治的诊断则具有二者择一的性质：或是官僚愈益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机构，废除新的所有形式，复辟资本主义；或是工人阶级粉碎官僚，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革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它扬弃了阶级与阶级的对立，从而也导致了政治国家的消亡（列宁说：“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这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这当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起一定公共职能〈分配上的“平等权利”等〉的、非政治的〈权力〉的残余存在。详细论述见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67—170页。关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理论的歪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16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84—285页。

曲，请参看《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8—12页），在经济上，这是在价值规律消亡的情况下，以实行“劳动证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章、第2章）制度为特征的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后还不可能立即进入这个社会。在此期间，还存在所谓“过渡时期”，在政治上，这一时期被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托洛茨基否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当然不承认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进入了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不由人民起义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俄国就不能到达社会主义。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仅仅是处在上面说的过渡时期社会（工人国家），而且这个过渡时期社会（工人国家）遭到了官僚主义式的歪曲，其歪曲及蜕化的程度是极其深刻的，以致于必然而且必须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推翻斯大林官僚的政治革命）。没有这场“政治革命”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根据其情况，或许“完全有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①——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就是处在这种变幻未定的中间阶段。

那么，既然俄国被歪曲和“蜕化”到必然和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托洛茨基还认为它是“工人国家”吗？联系到热月问题，对于不进行“政治革命”就不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托洛茨基还只把它看作“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而不认为它是根本意义上的“反革命”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介绍托洛茨基对于“蜕化了的工人国家”的“蜕化”状况的意见。在《被出卖的革命》等书中，对这些意见有详细的记述，由于篇幅的关系，希望读者能看一看这些书。这里，准备通过介绍托洛茨基对俄国“政治革命”提出的几项要求，从深处揭示他的主张。

“苏联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的斗争

^①《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页。

旗帜下，显然已经开始了。打倒官僚特权！打倒斯达汉诺夫主义！推翻苏维埃贵族以及其等级和官级！对一切形式的劳动支付更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把苏维埃这个阶级机关变成了（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神话。不仅需要在苏维埃恢复它的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要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象从前不让资产阶级和富农加入苏维埃那样，现在需要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赶出去。只有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以及红军士兵代表才能加入苏维埃。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要通过自由投票来表示，他们认为哪个党是苏维埃政党。

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地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必须夺回管理生产的权利。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消费者协会必须监督产品的质量 and 价格。

* 请注意，“各苏维埃政党”是复数。也许有许多人认为，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先锋”，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应以一党制为原则。当然，在不出现种种政治强制的情况下，这是可行的，但不一定是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要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请看一看巴黎公社，而巴黎公社实行的决不是一党制。虽然“无产阶级就其社会构成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差异性最小的阶级”，但它也有各种阶层。“由于有的向前看，有的往后看，所以同一个阶级也可能建立起几个党。”（托洛茨基语）。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存在曾经得到了认可。它们被取缔，只是由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条件所造成的暂时的特殊情况。“最初，党希望在苏维埃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内战严格地修正了这个预见，各反对党相继被取缔了。苏维埃领袖们并没有把这个与苏维埃民主精神明显冲突的措施奉为原则，而把它看作为了自卫的权宜之计”（《被出卖的革命》日文版第100页，《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35页）。特别是，托洛茨基考虑到了斯大林专政下的经验，允许并要求有复数的“苏维埃政党”。在关于莫斯科清洗审判事件的听证会上，托洛茨基说：“需要准备两个党……多半是三个或四个党的活动舞台”（《列昂·托洛茨基事件》英文版，第440—441页）。当然，这里说的各党是苏维埃体制内的党，与资产阶级的党无关——作者。

按照在当地劳动的工人的意志和利益，组织集体农场！

摒弃官僚的反动国际政策，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反对秘密外交！

在完全公开、公开辩论的情况下，诚实地重新审理由热月官僚演出的一切政治审判。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起义才能复活苏维埃制度，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引导苏维埃群众起义的党只有一个——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党”^①。

把以上各项要求与托洛茨基的以下论述对照起来看，就会抓住更清晰、更一致的要点。

“把苏维埃制度定性为过渡性的或中间性的，意味着放弃了资本主义（从而还有“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定了形的社会范畴。但是，这种定义不仅本身不十分完善，而且还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现存苏维埃制度只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它完全有可能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更完全的定义不能不是复杂、冗长的：

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1. 为了使国有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生产力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路程；

2. 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向原始积累的趋势；

3. 残存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

4. 经济发展逐渐改善了工人的境遇，但却迅速地生产出特权阶层；

^①《第四国际纲领》《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88—289页。

5. 官僚利用社会对立，使自己成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专制阶层；

6. 执政党虽然背叛了革命，但是社会革命仍存在于所有关系及劳动群众的意识中；

7. 正在积蓄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可能导向社会主义，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

8. 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摧毁工人的抵抗；

9. 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推翻官僚政府。结局是，问题要在国内舞台及国际舞台上，通过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解决”^①。

托洛茨基在上文里概要地论证、展示了斯大林主义俄国的“蜕化”或变态。那么，为什么苏联仍然是“工人国家”呢？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国有化是十月革命创造的成果，它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保存了下来。与此相联系，政权虽然确实从工人群众手里转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手中，但是这种统治官僚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整体之外的阶级，而不过是工人阶级中蜕化了的、“资产阶级化”了的特权阶层。如前文所述，托洛茨基说，政权“转到了更保守的官僚分子和工人阶级上层手里”。不过他认为官僚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这就是著名的阶层论。

“各阶级在经济社会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它们的特征。在文明社会，所有关系是由法律确认的。土地、工业生产资料、运输以及外汇的国有化和外贸垄断，成为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我们看来，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性质，在根本上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决定的。”^②“官僚仅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才继续保留了国有财产。

^①《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246页。

^②《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246页。

这种成为教皇的恐怖，是由布尔什维克、处于非法地位的列宁主义者的党（左翼反对派）所培育、所支持的……官僚作为有意识的政治势力背叛了革命。但是，获得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仅存在于纲领中和旗帜上，不仅存在于政治制度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体制里。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推翻它。统治阶层背叛了十月革命，但却没有能够推翻它。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关系、无产阶级的活的力量……有着伟大的抵抗力。”①

托洛茨基还写道：

“今天的斯大林统治与革命初期几年里的苏维埃统治既相似又不相似。一种制度取代其他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过某些方式，通过官僚反对无产阶级的某些小规模的内战而产生。历史的结局是，苏维埃民主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而炸毁了，官僚利用这种压力，从群众组织手里攫取了政权。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谈论官僚专政，甚至可以谈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但是，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恰恰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这种篡夺是可能的，而且能够保持到现在。因此，我们说，虽然在官僚专政中遭到歪曲，但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得到了体现。这是完全正确的。”②

“官僚专政——被歪曲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托洛茨基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斯大林》中被反复阐述③。托洛茨基认为官僚仅仅是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中一时生产出来的“癌肿瘤”④。从“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以及“被歪曲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出发，他从根本上反对官僚是一个阶级

①《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2—243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3页。

③《斯大林》日文版，第2卷，第534页。

④《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8页之后部分。

的主张。这是必然的。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统治官僚定性为工人阶级（在标准的“过渡时期”社会，工人阶级处在本阶级自我扬弃的过程中）之外的一个阶级，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工人国家”的观点就不能维持了。所以托洛茨基完全反对官僚是一个阶级的主张（对此所作的批判后述）。

总之，根据上述苏联观，在西欧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对立中——虽然绝对不降下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旗帜——必须“无条件捍卫”苏联。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根本战略观点。

2. “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缺陷与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观

在上一节里，我指出了，在苏维埃热月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无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差别，将它们做了错误的类比。这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托洛茨基本人的言论就涉及过这个问题。

“在从农奴制下解放农民、并分给他们土地的深刻的民主革命之后，一般是不可能出现封建的反革命的。被推翻的君主制度也许能再次掌握政权，让中世纪的亡灵包围自己，但是却已经无力重建封建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关系一旦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将自行发展，任何外部力量也无法阻挡它……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与此截然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从私有制的枷锁中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使被解放了的生产力依赖于革命所缔造的国家的直接自由。资产阶级国家在革命后仅起警察作用，而市场则依靠市场自身的规律。但是，工人国家却直接担负经济家和组织者的任务。某种政体转换为另一种政体，只给予市场经济以间接的、表面的影响。与此相反，如果资产阶级政府或小资产阶级政府取

代工人政府，必然将废止有计划的开端，接着就会导致私有财产的复活。同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向社会主义前进，是不能离开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或不得不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的。”^①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某种政体转换为另一种政体，只给予市场经济以间接的、表面的影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却根本不同。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②这种“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③。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直接担负经济家和组织者的任务”。接着，便是扬弃各阶级，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在这里，问题在于第一个阶段，即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如果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热月，政权从无产阶级大众手中转到了他人（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府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手中，例如象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转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手里，实际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关系、所有关系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导致私有财产的复活”，也是如此。因为，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决不仅仅是国有经济，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的国有经济。托洛茨基只盯着“私有财产的复活”，却完全忘掉了“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句话。

①《今日苏联》《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11—112页。

②《论土地国有化》《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7页。

③《共产党宣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9页。

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生产资料国有条件下产生的热月中，工人阶级如果被排挤出政权，当然也就被斥之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另一方面自然也就意味着，在生产资料国有的条件下，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官僚作为一个集团掌握了生产资料。因为在这里，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及“经济学家和组织者”，是生产关系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政权从工人手里转到官僚手里就不能不意味着基本的生产关系本身的变动。这就是说，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的生产关系、所有关系就不存在了。托洛茨基忘记了，第一、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不是单纯的国有经济，其本质内容是工人共同占有；第二、最重要的是(后面将要谈到)，过渡时期经济是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杠杆、征服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过程。如果官僚专政下的国有经济不是向着这个方向，而是与此相反(实际上，托洛茨基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说，这是生产关系、所有关系的更加有决定性的质变。托洛茨基注意的只是“私有财产的复活”，而没有着眼于这种经济学的分析。

如上面的引文所示，托洛茨基知道，在政权的转移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尽管如此，由于忘掉了以上两点，所以他说，“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就其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趋势而言，苏联今天仍然是工人国家”，虽然“不仅可以谈论官僚专政，甚至可以谈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虽然在官僚专政中遭到歪曲，但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得到了体现”。结果他作出了错误的类比，认为，如法国的热月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一样，斯大林的热月也是与之大体相似的东西。

我说过，托洛茨基忘记了“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

无产阶级手里”这句话。托洛茨基或许会争辩说，斯大林主义官僚不是工人阶级之外的一个阶级，而不过是同一阶级中寄生的特权者。但这是本末倒置的、荒谬的见解。是阶级还是一个单纯的特权阶层，这主要是由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就阶层说却与之背道而驰。列宁已详细地规定了阶级的定义^①。托洛茨基也说过：“各阶级在经济社会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特征”^②。假令如此，就不能先验地规定官僚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阶层，而要首先看这两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是，上文说过，由于官僚这个社会集团掌握了国家政权，所以即使以国家为媒介的官僚个人的所有，也仍然是官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工人群众，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团，都被完全排斥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之外，生产资料没有“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因此两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不同的、对立的。正因为如此，官僚才有可能剥削工人大众。这一剥削的事实，托洛茨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因而，应该抵制那种认为官僚是工人阶级中的暂时的、单纯的特权者的观点。虽然并非托洛茨基有意，就他的阶层说却仅仅是为了使“工人国家”的主张与马克思的国家论的原则不发生矛盾，仅仅是为了使“工人国家”的主张“合理化”！

再来谈“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第二个缺陷。这就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人民武装起义问题。托洛茨基在认识到了苏维埃热月后提出，需要的不是过去所主张的“改良”，而是“革命”（政治革命）。他主张，要“依靠劳动者的革命起义手段打倒官僚”。这一点前文已有介绍。“这个危机不会和平解决，任何恶魔都不会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不会不战而放弃他们的地位，事态

^①《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0页。

^②《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0页。

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①

但是，如果“蜕化”到了必须依靠人民武装起义，而且舍此则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么，这个国家不就已经不是工人国家了吗？不就已经超出了工人国家的范围了吗？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其他什么，不需要用这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社会。或者，在即使“蜕化”了、但仍是工人国家的国度里，用人民武装起义推翻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即便有这种可能，或作为一种可能，它真是工人的斗争方式吗？托洛茨基在1931年曾这样说过，如果“还是工人国家”，这种斗争方式难道是不正确的吗？不，它是正确的。

“承认目前的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用武装起义以外的方法不能夺取政权，而且表示还未失去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使官僚屈服于自己，或不发动新的革命，而是通过改良的途径和方法使党复苏，改善专政制度。”^②

无论怎么想，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与举行人民武装起义的主张都是相互矛盾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资产阶级派别的政府有可能被其他资产阶级派别用武力颠覆。但是，在工人国家（虽然工人国家的政府不一定没有犯过严重错误，或不一定不存在某些腐败现象），更迭政府根本不需要人民武装起义这种非常手段。因为，工人国家是“人民民主的惊人扩大”（列宁语），它“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就是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列宁语）。如上所说，它是包含自我扬弃的本质要素的“半国家”（列宁语）。因此，虽然存在着变态，但为了纠正它，用和平的、改良的手段就足够了。只有这

^①《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75—276页。

^②《苏联发展诸问题——国际左翼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草案》。

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工人国家的方法。如果这个国家“蜕化”到了需要人民武装起义，那就说明它已经丧失了工人国家的特殊本质，特别是丧失了自我扬弃的本质要素，因而实际上这个国家已自我表明，它脱离了工人国家的范围。斯大林主义国家正在走向自我消亡吗？——这是不可信的。无论工人国家怎样被歪曲，工人阶级也不能在自己掌权的国家举行武装起义。那样做，无异于反革命的行为。如果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时还需要人民武装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会大吃一惊（在马克思、列宁那里，根本不曾有过需要“政治革命”的“过渡时期”的概念。如果需要政治革命，就不成其为“过渡时期”了！）

倘若肯定武装起义，就必须放弃以往的关于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如果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正确，就不应发动人民武装起义，而应依靠非武力的、改良的手段。显而易见，托洛茨基关于在工人国家进行武装起义的观点是悖理的（现在在仍信奉“工人国家”观点的第四国际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托洛茨基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正逐渐销声匿迹。最早摆脱这种影响的，是新近故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记者多伊彻。）。

对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的说明就到此为止了。下面准备转到托洛茨基反驳他的理论上的反对者的问题上来。这些反对者认为，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或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官僚集产主义的观点不大能够成立，所以这里着重以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作为中心问题。

在托洛茨基派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常成为分裂原因之一的，就是对苏联的看法问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契机（1939年8月23日），托洛茨基派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大分裂。派别斗争从1939年8月持续到1940年4月。当时，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骨干分子马科斯·夏哈托曼

和詹姆斯·伯纳姆反对“无条件捍卫苏联”，并追本溯源，对“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抱有疑问。他们主张，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如今已不是值得保卫的“工人国家”，而是“官僚集产主义国家”^①。托洛茨基对这一观点的反驳收入了1942年在纽约出版的《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②。把夏哈托曼在此后撰写的文章包括在内，概括其意见，就是：“斯大林主义在俄国，或在它掌权的任何地方，都是残忍的极权主义——新的剥削形态”，“工人……是现代奴隶，他们的劳动力是归国家、亦即归官僚所有的动产。农民是国家奴隶，即相当于工业部门的现代奴隶的农业奴隶。”——因此，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现代集产主义的奴隶制。他主张，斯大林体制“尽管是无法预料的反动杂烩，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集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分。”然而，如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所评论的：“要使关于这种既是人类社会的集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分，又依赖于奴隶劳动的社会秩序的理论站得住脚是困难的”。这一派的见解不大能够成立，所以在这本小书中也就略去不谈了^③。

另一方面，在托洛茨基的营垒中，还出现了一些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与第四国际分手的人。他们是：曾任托洛茨基秘书的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④，约翰逊^⑤，英国的托尼·库里夫，米凯尔·基多伦等。实际上，笔者从1951年起也开始赞同这个观点。最早提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的，是德国的左

①参见多伊彻著《托洛茨基传》日文版，第3卷，第506页之后的部分。

②此书收入《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

③曾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今还在意大利健在的布鲁诺·里茨也在《世界的官僚化》（巴黎1939年版）一书里主张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请参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日文版，第3卷，第507页以下的部分。

④此人曾著有《异化与革命》，日本现代思潮社版。

⑤此人即撰写共产国际史的O·L·瓦·拉姆兹。

翼反对派领袖胡戈·乌尔邦斯（列宁同盟的领导人）^①。

由于我与这一派的主张和结论一致，所以就不能不十分关心托洛茨基为什么反对把苏联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加大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那么，他为什么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呢？他在哪些地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呢？

首先从回顾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开始。托洛茨基在他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

“自由资本主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抗议经济生活的国家化，但是这已经成了既定事实。从这个事实倒退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恢复自由竞争，甚至也不可能恢复托拉斯、辛迪加以及其他有势力的经济集团的统治。现在有一个、也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今后由谁来作国家化生产的负责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②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次演说（《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与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托洛茨基进一步说道：

“饶勒斯以及与他并驾齐驱的法国改良主义者经常谈论‘民主共和国的彻底社会化’。对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政治权力还在资产阶级手中，这种社会化就决不是社会化，它不会导向社会主义而只会导向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这是用在国家名义下完全同一了的资产阶级商行对铁路以及其他全部企业的所有，来取代各个不同的资本家对各种工厂、铁路等等的拥有。恰恰与资产阶级个人通过私人所有方式剥削‘它自己’的工人一样，作为资产阶级维持其政治权力的相同方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媒介，继续剥削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73页以下部分及第153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卷，第30页。

义’一词证明了，真正的社会化在工人夺取政权后才会开始。为了证明这一点，反对改良主义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或者说，在争论中使用了它。”^①

但是，多年之后，为了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又这样写道：

“‘国家资本主义’一词，原来是为了给资产阶级国家直接管理运输工具和工业企业时所产生的—切现象命名才出现的。对这种方式的需要本身是一个标志，它表明，生产力增长到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实际已造成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否定。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旧制度与否定自己的各种要素—道继续生存。诚然，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自己建立股份公司，由资产阶级国家来管理全部国民经济的状况。这种体制的各种经济规律没有丝毫表现出神秘的地方。众所周知，一个资本家以利润形式得到的，不是他的企业的工人直接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而是从这个国家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里，按其本身资本额所占比例分得的一份。在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下，这个平均利润率的规律不是通过不同资本间的竞争这种曲折的道路，而是立即并直接通过国家簿记实现的。但是这种制度还不存在，而且由于所有者之间的深刻对立，它也决不会存在——由于它具有资本主义财产的总贮藏所的性质，由于对社会革命来说，国家已成为过于富有诱惑力的对象，所以也就愈发如此了。”^②

列宁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反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进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在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文献中，这个词被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使用）的转化。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的话也表达了同一思想。它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2卷，第318—319页。

^②《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37—238页。

虽然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有经济的区别，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不足为奇。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1920年）中阐述了这一点。列宁在评论时对此表示赞同说：“正是！”^①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作为这种国有经济主体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按照公社形式组织起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4章），不是循着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那么无论其国有化如何彻底，仍然要否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我曾多次强调，是否理解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在托洛茨基的言论中，比这一点更能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托洛茨基主张，他所说的“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但在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就扬弃价值规律的问题再讲几句，因为这是个不大容易透彻理解的问题。

第一、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雇佣劳动制度）是扬弃价值规律的杠杆。在资本家的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成为全面、基本的经济规律，而资本家的商品生产又是以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基础的。回顾《资本论》中的这些论述，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列宁也说过，“所谓资本主义，就是那种甚至连劳动力也成了商品的、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

第二、只依靠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来扬弃价值规律是困难的。扬弃价值规律同时又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因为，无论实现什么样的集体化，只要生产力没有达到满足上述要求的水

^①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8页。

平，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了高速发展生产，就不得不反过来加强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剩余价值规律。这样一来，就不是征服价值规律，而是拜倒在它的面前（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16—19页、第340—341页）。如果只依靠集体化就可以扬弃价值规律，那么建成“一国社会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天起就变得简单之至了——虽然这个国家还处在落后的经济阶段！

如果把以上内容作为扬弃价值规律的客观条件，那么其他应被称为主观条件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①，亦即觉悟到这一点的无产阶级的斗争。

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是，在理论上诚然可以想象、但在实际上、在历史上不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常常有的，我也不否认这一点。

那么，前面引文中托洛茨基所举出的两点理由在“完全的资本主义”下又会怎样呢？

首先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也认为，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例如马克思曾说过，资本集中的极限“将是在仅仅一个资本家，仅仅一个资本家公司手里合并了全部社会资本的时刻”^②。而且如拉雅女士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不是在《资本论》的初版中，而是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特意加上说的话，所以它就更为重要。恩格斯在其著名论述中说道：“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③

①《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18页。

②《资本论》日本岩波文库版，第4分册，第119页。

③《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3页。

恩格斯指出了国家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认为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恐怕他即使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话，大概也记住了恩格斯的话。布哈林在其批判罗札·罗克森布鲁克和兹根·巴拉诺夫斯基的积累论的有名著作《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也设想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并论述了它与经济危机的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当列宁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的、有监督的和有社会化的东西”，或谈到“全民的统计和监督”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69页，第32卷第326页）时，他所着眼的是相当彻底的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在实际上、历史上情况如何呢？

马克思没有特别谈到过这一点。但只要看了他所读过的《反杜林论》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会知道，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相当程度上是接近这种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的。然而，一般说来，资本主义通常步履迟缓，它很难使理论上的这种极限状态彻底化。在这一点上，我基本上同意托洛茨基提出的反对意见。然而，历史比平庸的教条主义者所想到的要复杂。例如拿托洛茨基本人也首先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热月时代的到来（在苏联，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事来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吗？在代表这种热月的同类政治集团掌权的情况下，它不是可能的吗？虽然现时代是高度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反动或反革命不可能倒退到复活私人资本主义，但是，使过渡时期经济向后跃入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的极限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极点），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吗？实际上，这才是苏联论的核心问题！

只联系生产力的问题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在普通的资本主义下，如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说，“生产力增长到超出了资本主义的

范围”，（以各种危机的直接发生为媒介）一般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虽然要达到上面所说的极限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国有化，但生产力还没有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情况下——与上述情况相反，它有可能一举实现“资本主义的极限发展”。虽然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如托尼·库里夫在批判托洛茨基的苏联论时所说：“反动的胜利常常并不意味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它使革命前的要素与革命中的要素相结合，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以螺旋形式倒退。”^①

当然，在这种场合，“结合”不是机械式的，而是“革命中的要素”的变质。例如，自从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以来，由于工人被排斥于国家政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所以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就变质为其他类型的国家所有，只剩下了国家这样一个抽象的形式。托洛茨基虽然有意味地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但不幸的是，他抓住的仅仅是这个残存下来的形式，并用以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十月革命所缔造的不仅仅是这种抽象的形式。国有固然是国有，但十月所生产的，是在本质上导向扬弃劳动力商品化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这两者间有决定性的不同。

可见，托洛茨基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反驳是离奇的。因为他承认，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专政下，工人不处于掌权地位，而且这种官僚专政远远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公社式国家，与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为杠杆的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也相去甚远。例如，前文曾引用过，托洛茨基说：“今天的斯大林统治，与革命初期几年间的苏维埃统治既相似又不相似。

^① 托尼·库里夫《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英文版，第145页。

一种体制和其他体制的交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过某些方式，通过官僚反对无产阶级的某些小规模内战而发生。历史的结局是，苏维埃民主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炸毁了。官僚利用这个压力，从群众组织手里攫取了政权。”^① 斯大林主义者说：“我国工人既不是工资奴隶，也不是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他们是自由的工人”。对于这种宣传，托洛茨基认为，“在现在，这种讨好奉承的口头禅是不能容忍的大话。”他说，“……（苏联——译注）以甚至连资产阶级各国的改良主义工会也不允许的、如此赤裸裸的、露骨的方式，使用了计件工资制这种典型的剥削方法”^②。

事实上，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斯大林主义体制正是如此。拉雅女士说过，斯大林主义体制所采取的积累方式是以雇佣工资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基础的所谓生产财富中心主义这种本质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为生产而生产”的制度）。R·丹尼尔斯在他的大作《革命的心灵——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中说：“作为马克思所想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的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选择了这样一种制度，即强制促进落在工业西欧的进步后面的地区的发展的制度”^③。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正是这种东西吗！

总而言之，把这种制度纳入“过渡时期”范畴，是与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社会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背道而驰的。前而说过，实际上，托洛茨基号召举行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人民起义（“政治革命”）一事本身就已自动表明，这种制度是不能纳入“过渡时期”范畴的。如果托洛茨基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那还另当别论。我特别为这位大革命家惋惜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3页。

②《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33、73页。

③R·丹尼尔斯《革命的心灵——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53页。

的是，他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但还是被“国有拜物教”俘虏了。这本小书的第2章详细论述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继承者。但是仅仅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离开了马克思的正统继承人的道路，把社会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我也完全赞同托洛茨基居住墨西哥时曾一度担任过他的秘书的拉雅女士所说的话：“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和列宁局限在私有财产等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于社会主义这个被歪曲了的哲学框框内。由于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等于国有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区别，所以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斗争，但是他的思想却不可能有力量指示独立的方向。”^①

最后谈一谈应该如何给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层下定义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托洛茨基的阶层说是错误的。那么，如果将斯大林主义官僚看作一个阶级，应该定为什么阶级呢？我认为，恩格斯已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随着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②

恩格斯的这段话，至今几乎还未被注意。但是，为了了解苏联统治层（不，是所有斯大林主义社会体制的统治层），这恰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可以把这些统治层规定为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雇佣职员的最高形式。这是“资产阶级之外的资产阶级”。我想，可以简单明了地称之为“号外资产阶级”。

上面对托洛茨基的苏联论作了批判性的解说。但是最后应该补充一个问题。这就是，托洛茨基认为，“蜕化的工人国家”不是长

^①《异化与革命》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94页。

^②《反社林论》《马克思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3页。

期存在物，而是“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插曲式的倒退”^①。还有与此有关的、托洛茨基如果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他极其固执地主张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他也许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的问题。不，不是也许，托洛茨基一定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的。前面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托洛茨基没有脱出“国有即工人国家”这个国有拜物教的巢臼，但他并不是他的追随者（特别是托洛茨基去世后的第四国际）那样的榆木脑袋。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超越托洛茨基主义》一文里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50页以下部分）。囿于本书预定的篇幅，所以准备简单、概要地对此加以阐述。

首先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引起世界（特别是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导致推翻苏联的官僚专政政治的预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至少也是与世界革命正在临近的形势判断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在他撰写的第四国际纲领（1938年9月）中指出，形势处在革命前夜。文中写道，“无法设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②。

但是，万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起点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和扩大遭到失败该怎么办呢？——虽然托洛茨基几乎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体制是“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插曲式的倒退”——倘若如此，也“只有在那时，才有必要来从头确切证明，就其根本特征来说，现在的苏联是国际规模的新剥削制度的先驱”^③，这也就是说，应该重新研究“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虽然这同时还伴之以“无产阶级不可能天生为统治阶级”等极端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2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60页。

③《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60页。

悲观主义的反省)！

当然，托洛茨基不相信局面会变得这样。在他看来，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问题上。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写道：“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不管是否存在工人方面的抵抗。如果这些全新的关系固定化、标准化、合法化，那么其结果就完全清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①。这一主张正好为理论的重新研究开辟了道路。因为，仅仅囿于那种单纯的国有形式，而对生产关系、所有关系缺乏深入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特别是价值论以及积累论的分析）的托洛茨基竟然也认为，在这里谈的虽然是国有经济，但也有可能产生“完全清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的情况。这表明，他虽然也囿于国有拜物教，但并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执迷不悟。虽然1936年时他仍然说，“目前谈论这一点，至少还为时过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不幸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再明显不过的是，托洛茨基没有象他预料的那样，看到“十月革命”在先进国家的“继续”。所以，几乎毫无疑问，如果托洛茨基本人活到战后，他将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虽然第四国际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都避开研究这个问题，但托洛茨基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总之，“蜕化的工人国家”从1924年延续到今天，以后还不知要延续多少年。它度过了这样长的时期，这是托洛茨基做梦也想不到的。工人国家的“蜕化”状态不可能这样长久地继续。托洛茨基说过，“蜕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以垮台告终”^②。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的独特组合，首先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掌握政权。但

^①《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1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是，这一同样的势力布局也预示着：没有无产阶级在先进国家的或迟或早的胜利，俄国的工人政府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唯一剩下的，不能不是苏维埃制度的垮台或蜕化。更正确地说，是先蜕化，后垮台。1905年以来，我本人不只一次地写到过这一点。”^①

托洛茨基说：“是先蜕化，后垮台”但第四国际的追随者脑子里到什么时候也只想着“蜕化”，不然他们就不心安理得！

托洛茨基的未亡人娜塔莉娅毕竟不同，她已经采用了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她在去世前不久向法兰西晚报的报道提出抗议的一封信（1961年11月9日）里表明了这一点。她写道：“如果不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使成为产生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基础的全部警察组织、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解体，那么一切非斯大林化运动显然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补记〕托洛茨基派的杰出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津斯基在《新经济》一书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而是计划经济的产品；不是价值，而是劳动时间的计算；不是作为发现价值规律的场所的市场，而是计划经济的簿记；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产品”（《新经济》日译本第68页、英文本第48页）。但是，应该进一步补充的重要之处是，在分配上实行的是劳动证书制度。这就是普列奥所说的“对集体工人进行的消费者分配取代了工资”。但是，由于对这一点的理解要以对马克思的价值论的理解为前提，所以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如此，但不理解这一点，就绝对不可能从经济学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希望务必要对此加以研究。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第四章 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 批判与第四国际

“新教义（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说，只要没有外来干涉，就能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因此，为了避免外来干涉，可以采取、也应该采取对外国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可以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即可以保证解决主要的历史课题。因而共产国际各党的任务就带有了辅助性质。它们的使命是保护苏联免遭干涉，而不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当然不是主观意向的问题，而是客观逻辑的问题。”^①

“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被贬为与军事干涉作斗争的辅助性武器。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共产国际的体制以及其领导人的遴选与共产国际被贬为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辅助部队的情况是完全相称的。”^②

1924年秋首次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信号，它表现了那种企图把苏联外交从国际革命纲领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但是，官僚并没有想中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果那样一来，就会使共产国际变成世界性的反对组织，这将对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产生不利的影晌。相反，克里姆林宫的方针越是置以往的国际主义于不顾，共产国际的舵把在一伙统治者手中就攥得越紧。如今，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13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13页。

共产国际已经在旧名称下为新目的服务了。而新的目的需要新的人物。1923年秋开始的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是通过一连串的宫廷改变、自上而下的清洗和流放、更迭莫斯科和各国支部的干部的历史。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成了完全从属于苏联外交、为苏联外交服务的机构，成了可以在任何时候，走任何曲线的机构。

写到这里我必须致歉。因为按原来的计划，我应把下面谈到的几点分节详细论述，第四国际的问题还应单辟一章。但是，由于在托洛茨基的核心理论——不断革命论上花去的笔墨过多，所以到这里，这本小册子剩下的篇幅不多了。因此，很遗憾，我不得不把以上问题集中到这一章里，做一个简单的速写。我准备将来从根本上对共产国际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详细论述只有放到那对时了。因此在本书结构上，它带有一点附录的性质。下面马上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危机或繁荣这种景气变化“不过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创造了好一些或坏一些的局面。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以亲手创造历史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为前提的。这些人不是偶然地或随意地、而是在一定的客观原因支配下创造历史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行为——决心、勇气和献身精神或与此相反的蠢举和怯懦等——是历史发展链条上必要的一环。”但是，在“蠢举和怯懦”等成为“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时，历史会怎样发展？特别是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党表现出这种蠢举和怯懦时，历史发展又会怎样？革命形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具备一定客观条件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在促成革命形势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无产阶级的党麻痹工人、欺骗工人……置革命任务于不顾，那么这个时期产生的无疑就不是革命形势，而是反革命的形势了。”①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55、58页。|

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卧病不起的1923年后的共产国际总的说来，是作为一部“蠢举”的历史阻碍了革命历史的发展。托洛茨基在收入《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书附录中的一封信里写道：

“十月革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无产阶级一系列惨痛失败而导致的世界革命的迟延。1923年以前，这些失败是在共产党尚不存在，或在此之后，共产党还很弱小时所目睹的战后运动和起义的失败。1923年后，形势急剧变化，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已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还有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以及中国铸成的大错和在其他国家所犯下的较小规模的错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样的错误只有在1905年到1917年以及还要早几年的孟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才能找到。”^①“诚然，如果有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德国的无产阶级是能够夺取并保持政权的；诚然，如果领导层做出了正确预见，英国工人阶级无疑将推翻工党，因而使无产阶级的胜利大大提前；或者，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被哄骗、被硬推到国民党的旗帜下，它们无疑将胜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并率领农民夺取政权。这样说，是在毫无实际意义地卖弄聪明，但是，门是对这三个可能性敞开的。对于德国更是大门洞开。相反，领导阶层却采取了反对阶级斗争的行动，牺牲自己的阶级去加强敌人，为保证失败干下了一切。”^②

上面所说的“德国、英国”的英国，指的是1925年到1926年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事件^③。所说的德国，是指在革命地利用1923年秋德国的革命形势上的彻底失败的事件。托洛茨基所说的“错失革命形势的实际范例”，指的就是这一事件^④。这是极其重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46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46页。

③同上，第253—254页。

④同上，第89—96页。

大的事件。在此之后，就开始了资本的所谓“相对稳定”时期。托洛茨基说：“德国革命一失败，就开始了对反对派的第一次袭击。它的作用是使这次失败臻于完善。这场袭击是根本不可能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在的。”^①

1. 斯大林与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

最初，托洛茨基把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在当时的共产国际执牛耳的三人帮中的季诺维也夫等人。1924年，托洛茨基在他发表的《十月的教训》^②中暗示，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曾采取反对立场，与此相联系，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中，他们又站在了同样的立场上。后来，托洛茨基自己也写道，他认为当时的斯大林是“比季诺维也夫要左得多的左翼中间派”。他抨击的靶子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后来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联合，揭开了过去三人帮领导层的内幕。于是，事情变得很明白，在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上，与季诺维也夫相比，斯大林要负更大的责任。R·丹尼尔斯在《革命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中说，斯大林曾在1923年8月初的一封信中强调他反对德国的起义。而德国革命失败的直接祸首就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拉狄克（当时主管德国问题）以及受到拉狄克支持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布兰德勒等人。

这封有名的信是写给当时在北高加索的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在1927年8月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到了这封信，斯大林虽然竭力辩解，推脱责任，但还是不得不勉强承认有这样一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57、159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

封信^①。

关于斯大林的这封信，无论是当时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塔尔哈依玛还是左派路特·费舍都曾提到过。托洛茨基也多次谈到过这件事。斯大林在这封信里写道：

“如果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企图撇开社会民主派而取得政权，他们是否成熟到足够实现这一点呢？在我看这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取得政权时，俄国已经具备了下列条件：一、和平；二、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的支持；四、农民的同情。而德国的共产党人还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作为他们的友邦。我们则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现在能给他们什么呢？在今天的德国，如果现政府倒了台，共产党人取得了政权，他们也将稀哩哗啦地垮掉。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将是他们被击为齑粉。所有的一切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一定将把这种教训——实际教育——变为全面的战斗（今天一切机会都在他们一边），消灭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主义者没有在睡大觉，但是如果他们首先进攻，将对我们有利。这将使全体工人阶级集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与保加利亚不同）不仅如此，所有情报都证明，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是软弱无力的。我的意见是：应当使德国人节制自己，而不要鼓励他们。”^②

当然，按照“斯大林神话”，事情就截然相反了。例如这样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时刻，斯大林同志主张建立苏维埃，由共产党立即掌权。但是，德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的领导集团（塔尔哈依玛、布兰德勒）在已经成为当时的德国谍报机关走

^①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78页。

^②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2页或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英译本，第306页。

狗的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支持下，拒绝了斯大林的计划，背叛了革命。”^①。多么可怕的神话！

2. 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问国

第一次中国革命爆发于1911年(辛亥革命)。1644年建立的清王朝虽然没落了，但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是极不彻底的。随后，在1924年到1927年，又发生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第二次中国革命。1926年7月，得到苏制武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援助的蒋介石进行了有名的“北伐”，在南京建立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过，这时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汪精卫(汪兆铭)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建立了武汉政府(作为装饰品，中国共产党中也有农民部长谭平山和工人部长苏兆征入阁)，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结果不久就向南京政府屈服了。

围绕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政策，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当时的多数派——斯大林、布哈林联盟与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反对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原来的孟什维克、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阿尔齐诺夫把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称为“四家联盟”(“bloc of four classes”*)。这种称呼很恰当地表现了这种政策的特色。斯大林和布哈林把第二次中国革命定性为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主张推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四阶级联合政策，由中国国民党充当领导者，让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采取取消共产党独立性的、追随国民党的路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后，他们又相信汪精卫的武汉

^①山道健太郎著《共产国际史》日文版，第205页。

*括弧内的英文为“四个阶级的联盟”一译者。

政府，在1927年4月还称之为“革命中心”，让中国共产党服从这条路线。

斯大林、布哈林对当时处于这种中心地位的国民党总的说来是怎样看的呢？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斯大林称国民党为“革命民主的组织”或“广大革命组织”^①，布哈林也说：“国民党是特殊类型的组织，它介乎于政党与有不同阶级的团体参加的苏维埃式的组织之间。……国民党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就语言的通常意思上说，从组织上看，国民党并不是党。”^②这些观点的机会主义性质是很清楚的。在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一个星期之前，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圆柱大厅召开的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还发表了对蒋介石表示信赖的演说，这最雄辩地、最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极端机会主义^③。

但是，武汉政府垮了台。1927年8月，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宣告：“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结束了”。虽然革命形势正在转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突然向左摆，开始宣传建立苏维埃（联合反对派还在革命早期就提出了这种主张，斯大林派认为这是“与革命的国民党斗争的口号”而加以拒绝）。1927年12月发动了“广东起义”这种极左的暴动，结果遭到惨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这场大失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农村为基础的毛泽东的路线抬头。结果，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行将到来的革命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质变，遭到了歪曲。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

①《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73、274页。斯大林实际指的是国民党武汉政府，详见原文——译注。

②布哈林《中国革命诸问题》（1927年）。

③阿依孔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译本，第258页，《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第59、75、234页；第3卷，第99页。

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关于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批判，请看他写给中国左翼反对派（陈独秀派）的《中国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等文）。

那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合反对派在哪些地方对这条斯大林、布哈林派的路线进行了批判呢？

批判的中心就是：斯大林派过高评价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党——国民党，相反却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这是孟什维克的方针。因此，必须拒绝斯大林派提出的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让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恢复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虽然斯大林派把国民党或国民党左派看作“广大革命组织”，反对建立苏维埃，但还是必须号召建立苏维埃。在联合反对派的政纲《俄国真相与共产党的任务》（1927年9月）中指出：“还在1920年，列宁就向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在1926——1927年的各种条件下也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口号的正确性。中国的苏维埃将采取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加强农民力量的形式。它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真正机关。它是真正地支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以及从国民党中产生出来的卡芬雅克的机关。”^①

总之，论争的核心就是如何评价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②但是斯大林却积极提出了“无视列宁这一论断的方针。列宁在为这次大

^①《俄国真相与共产党的任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96页。

^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11页。

会草拟的提纲中还主张：“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要绝对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①。斯大林同样积极提出了无视列宁这一论断的方针。

在这里，应该谈一谈前面曾引用过的联合反对派政纲中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因为斯大林派也提出过与这一公式相同的公式。例如在斯大林支持武汉政府的时期就说过：“武汉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②。但是与联合反对派的决定性的不同在于，斯大林派把国民党左派政府视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政治表现。与此相反，联合反对派强调，不要相信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应该把自己的基础放在工农苏维埃上。在前面提到的反对派政纲中指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如果在中国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前时期，将有一切可能按照苏联的情况变化，比较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联合反对派的这个政纲借用的是托洛茨基曾顽强反对的二月革命前的孟什维克的战略公式。为什么以托洛茨基为领袖的反对派的政纲会成为这种战略公式的经过我已经作过说明。虽然托洛茨基个人曾加以反对，但它是与季诺维也夫派进行政治妥协的产物。丹尼尔斯教授也做了说明：“为了与季诺维也夫派和解，托洛茨基在‘把它与列宁的真正观点区别开来的条件下’，声明放弃了不断革命论（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作为交换，季诺维也夫集团承认托洛茨基对党的机构——即使是在它包括了季诺维也夫派

①《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29页。

②《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03页。

的情况下——的抨击是正确的。”^①

但是，托洛茨基后来说，这个“原则性妥协”是错误的。因此，1927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派投降后，托洛茨基又恢复了他原来的论点。例如，在批判（由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书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展望》一章里，托洛茨基就阐述了这种纠正了的“中国革命论”，这个观点后来一直终其一生。在我看来，即使称为“工农民主专政”，但是只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这个专政中是强有力的，只要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专政中起决定作用，那么即使没有意识到，这种专政在事实上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相差无几了。虽然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派是出于如此考虑才不顾托洛茨基个人的反对而与季诺维也夫派妥协的，但是我却有这样的想法。总之，托洛茨基提出了在中国进行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独立、统一和解放、土地革命）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一阶段革命论，并认为1927年12月的广东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本身是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企图——证明了他提出的一阶段革命论的正确性。

“我们反对派认为，这次起义是为拯救领导者们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对我们说来，事情很明显，即使这是冒险，它也仍然是按照社会环境的结构所决定的规律发展的。我们从广东起义中寻求中国革命未来局面的特点的理由也就在这里。这些特点与我们在广东起义前所做的理论分析是完全一致的。”^②“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只字未提，尽管与上海、汉口以及其他中国工业中心相比，广东事实上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反对国民党的革

^①《革命的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英文版，第275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97页。

命暴乱还是自动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发现全部形势都使得它不得不诉诸于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烈的手段。无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表面上看去如何，它都是从中国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革命的全部发展中完全合法地产生的。”^①

不过，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大失败后，托洛茨基就认为革命正在转入低潮，反对起义计划和一切极左的方针，他援引了列宁的话：“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②，主张应该在一系列的民主口号（议会、8小时劳动制、土地国有、中国完全实现民族独立，等等）下展开斗争，以恢复党的力量，准备第三次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③。

另一方面，斯大林派否认革命已进入低潮。他们联系所谓资本主义“第三时期”论，仍然让中国共产党服从于极左盲动。这就是李立三、王明时代。结果造成了毛泽东主义这种民粹分子化的斯大林主义的兴起。

为了进一步理解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有必要同时阅读不久前翻译出版的哈洛尔德·阿依札克斯的名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两卷本，至诚堂出版）。因为这是一部用具体例子有血有肉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批判的著作。关于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历史，今天要寻找比这更多的论述恐怕是困难的。关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的中国左翼反对派（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翻译得不多，可以看波多野乾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第437页以下部分。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79—180页。

②《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93页。

③《共产国际第8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

3. 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

下面先谈谈“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然后再转入“人民战线”论。这是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尽管斯大林派为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进行了辩解，但是他们对于这次大失败，对于未能成功地利用三十年代世界大危机达到革命的目的，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①。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之所以没有成为政治变革的有力杠杆，实际上是由于有意识地妨碍了它的结果（三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转变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共产党”。结果，这一方面使相当于“过渡时期”社会的苏联本身逐渐变质，成为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延长了寿命。斯大林和他的党不仅背叛了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背叛了国外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这也是我的意见）。

斯大林在1924年9月发表的《论国际形势》一文中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②这就是斯大林的有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最初公式。由于1929年后斯大林派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的论点。这个公式又得到了新的加强和扩充。特别是在纳粹主义崛起时期的德国，它成了一块试金石。

^①《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1月1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82页。

^②《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页。

所谓“第三时期”就是指，在第一次大战前后的革命时期（到1923年为止）和继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之后，从1929年起，是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崩溃的时期。综合当时的斯大林派的领导人的言论，这个时期被看作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在很短时间里就接替倒了台的布哈林而成为共产国际领袖的莫洛托夫当时就说过，不可能有“第四时期”，因为“第三时期”只能、而且行将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总之，在“暴风雨般的革命高潮”和“工人阶级集体激进化”的时代，德国、法国、波兰等国家被特别指定为“革命攻势的第一线”，同时，不仅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法西斯化了，社会民主派也法西斯化了，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因此，与社会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是极其有限的。在1929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定中，与社会民主派的统一战线被限制为“仅仅是基层的统一战线”或“反对社会民主派领导集团的统一战线”（顺便指出，如休托路姆塔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日本岩波书店版〉中所说，“社会法西斯主义”一词的正式公布是自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之后）。

不仅如此，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方针，主要的打击对象不是法西斯主义本身，而是被视为法西斯主义“温和派”的社会民主派——“社会法西斯主义”。甚至在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的六个月前，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行委员会全会还这样宣布道：“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必须主要打击社会民主派。因为，使社会民主派在无产阶级中陷于孤立，是获得工人阶级多数的先决条件，是战胜法西斯主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①

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受到了谴责，这种观点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群众的欺骗。例如，继莫洛托夫

^①Guide to the X I plenum, E.C.C I Sept. 1932, P. 65

之后，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第十一次执行委员会全会（1931年3—4月）上说：“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了欺骗人民群众，故意把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为害较小’的整个理论的确是建立在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的假想上的，难道不是如此吗？”^①

这种理论、政策、策略在三十年代的前半个时期主要应用于纳粹主义正在崛起的德国，结果在1933年以希特勒的大胜告终。作为史实，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现在回顾起来，1929—1932年的世界大危机在德国也是极其严重的。在政治上，它一方面表现为德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却又表现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突飞猛进。1920年8月成立的希特勒的党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还仅仅只有十二人当选（约八十万票），不过是位居第九的政党。但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有一百零七人当选（约六百四十万票），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政党。然而，共产国际以及台尔曼的德国共产党却大大低估了纳粹党的这一步大发展，认为纳粹党已达到其顶点，今后将走下坡路，因而仍旧推行“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提出的政策。现实嘲笑了它们。两年后的1932年，纳粹党上升为第一大党，并于1933年1月30日建立了希特勒独裁政权。同年3月14日德国共产党被取缔。6月2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被取缔。

但是，如果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立反纳粹统一战线，对抗纳粹主义，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纳粹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的力量不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总和的

^①The Communist Parties and Crisis of Capitalism, P. 112

一半。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稍稍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力量的总和。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失去了三十五个议席和二百万张选票，又略低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总和。单从这一点看，如果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立了反纳粹统一战线，是有很大把握制止纳粹主义取得胜利的。

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以及建立在这一论点上的政策和策略却与这种统一战线背道而驰。由于认为主要敌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社会民主党，并把主要打击矛头首先指向后者，所以不仅不能逐层地形成社会民主党领袖本来就很害怕的统一战线，相反，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形成了共产党与纳粹党的反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1931年8月，德国共产党就参加了纳粹党举行的旨在推翻社会民主党人掌权的普鲁士邦政府的人民投票，形成了共同战线。在柏林交通罢工时，也曾出现过这种共同战线。

托洛茨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针对着这种理论、政策和策略的。这一批判积极主张遵循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为前提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这个策略的最初公式是1921年12月发布的《共产国际关于对工人统一战线、第二国际、第二个半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中的工人以及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指令》），形成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纳粹统一战线。不言而喻，托洛茨基是把社会民主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左翼支柱而加以反对的。但是，把社会民主派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是荒谬的。面对纳粹主义的威胁，建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由于纳粹主义危及自身，因此至少对于党员群众来说，是存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而布署了这条防御战线，就有可能伺机发动进攻，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这

就是通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纳粹统一战线、“分进合击”、“积极防御”的战术。

在纳粹主义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迅速发展后，托洛茨基根据这个基本方针写了许多文章，如《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形势》（1930年9月）、《德国是国际局势的关键》（1931年11月）、《下一步是什么？》（1932年1月）以及《唯一的道路》（1932年9月），等等（均收入《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7卷），力主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改变政策。斯大林派听不进正在国外流亡的托洛茨基的话，反而骂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分子”，攻击托洛茨基的主张。例如，当时任共产国际组织部长的奥西普·皮阿托斯基就曾这样抨击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论：“叛徒托洛茨基提倡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企图救助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帮助法西斯分子而一无所为的时候，为反法西斯斗争而建立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盟’的必要性究竟在哪里？”^①

在这里，读一读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论是不无益处的。在著名的《下一步是什么？》里，托洛茨基概要地引用了他在1922年3月起草的一份文件（《论统一战线》）。这份文件作为关于法国共产党问题的报告的资料，是为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而作的。下面就是其中的部分摘要（这份文件曾得到俄国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正式承认）：

“共产党在确认了它的完全独立、它的党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完全一致后，正在为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置于其影响下而斗争。由于客观形势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的有效程度，这种斗争或者得到促进，或者被迫后退。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在这种革命准

^①《共产国际》杂志英文版，1932年3月15日号。

备时期也决不会停止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与全体工人阶级、它的大多数、它的各个部分性命攸关，所以在这场大斗争中，工人群众正在感到在行动中、在对资本主义猛烈进攻的抵抗中或在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中实行统一的必要。机械地反对这种行动统一的必要的党，无论是哪个党，无疑都将受到工人的谴责。……在目前的时期，尽管不能不承认，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的各种政治组织间，分裂仍不可避免，但是，统一战线的问题却是从为了工人阶级而与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中确保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这一迫切需要中产生的。对于不理解这一任务的人来说，党只不过是宣传组织，而决不是群众行动的组织。在共产党不过是少数派的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在群众斗争的局面下行动的问题没有决定性的实践意义或组织意义。在这种条件下，群众斗争还处在由目前还顽固存在的传统起决定作用的旧组织的领导下。同样，例如在保加利亚那样的共产党仅仅是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的国度里，则没有产生统一战线的问题。

但是，在共产党已经拥有了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却还未具有决定性的强大力量的地方，在党仅仅组织了无产阶级先锋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方，甚至是在组织了无产阶级先锋的过半数的地方，在这种国家，共产党面对着尖锐的统一战线问题。

如果不与社会民主派进行决定性的决裂，共产党将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将不能向革命的道路迈出重要的一步。……无论是什么人，不理解这一点，就连共产主义ABC的A也不会认得。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求这样的组织路线，旨在使属于共产党的工人与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内的不属于共产党的工人间的统一协调的行动成为可能，那么共产党就将表明，它无力——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获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共

产党只能堕落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机器，而决不会发展为以获得政权为目标的党。……

统一战线将在工人群众的基础上展开还是在机会主义领袖的基础上展开？以这种形式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不理解问题的结果（统一战线策略以及与之有关的“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第四次代表大会与在列宁死后，由季诺维也夫扮演主角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有很大不同。即，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工人政府”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个问题上，同时特别强调“来自基层的统一战线”，拒绝了“上层的统一战线”。可以说，这是迈向“社会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来自基层的统一战线”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能够使群众很容易地在我们自己的旗帜，或我们的直接的实践口号周围统一起来，不分党派、工会，越过改良主义者的组织，那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统一战线问题就不会以现在这种形式存在了。问题就出在，工人阶级的一些重要部分属于改良主义的组织或支持它的组织。他们目前的经验还不足以使他们脱离改良主义的组织，参加我们的组织。在这种关系中起重大变化的因素恰恰将出现在他们投身于目前已提上日程的群众活动之后。我们所正在努力的也就是这一点。……

改良主义者的害怕群众运动中潜在的革命力量。他们所喜欢的舞台，是议会的讲台、工会的办公室、劳动调停局以及内阁的休息室。与此相反，我们把一切其他的考虑都放在一边，把改良主义者从他们的避难所中拖出来，让他们与我们肩并肩地去关心从事斗争的群众所面临的问题。只要采取正确的策略，这样的事情只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怀疑、害怕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就象那些虽然承认有关最好的游泳方法的规则，却不敢跳到水里去的游泳者。因此，战线统一的前提是：只要改良主义者们代表参加了斗

争行列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志，我们在有一定界限的内部，并进一步在特殊问题上就准备使我们的行动与改良主义者团体的行动在实践中一致起来。……

在争取与其他组织间取得意见一致的时候，我们应当在行动中遵守一些纪律。但是这些纪律决不能是绝对性质的东西。改良主义者们在妨碍斗争，显然开始在中止斗争，采取违反群众情况和意愿的行动。在这种时候，我们保留作为独立组织，不断斗争直到最后——即使没有我们的暂时的半同盟者——的权利。对那种认为一次也不用离开自己的编辑室，只凭彬彬有礼的批判就可以甩掉改良主义的看法深信不疑，害怕在工人大众眼前与改良主义者冲突，害怕站在群众斗争一边，使工人大众有机会评价共产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式的立场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不能在这种政策中谋求与改良主义者的和解。

我们正是为了获得对工人运动内部的背叛、犹豫不决以及半途而废的情绪的批判的充分自由才与改良主义者和中间派决别的。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决不能承认任何形式的组织与组织间的协定，限制我们进行批判和鼓动的自由。我们将参加统一战线。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也不会统一战线中溶化。我们是作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部队活动的。毫无疑问，在斗争的进行中，广大群众通过经验将会看到，我们比任何人都要斗争得更好，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清醒地注意局势，比任何人都要更加勇敢、更加有决断力。……”^①

我相信，这段稍长一些的摘要是值得细读的。以这种统一战线策略为准绳，“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时代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则可以说是从极左方面对这个等于对之持否定态度的统一战线策略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2卷，第119—126页，或第7卷，第152—154页。

进行歪曲的例子（后面谈到的“人民战线”时代，可以说是与此相反的、从小资产阶级的、右的方面歪曲这个统一战线策略的例子）。

总之，斯大林派的德国共产党拒绝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结果败在了希特勒手下。尽管如此，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后的1933年4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务会议的决议中仍然声明：“直到希特勒政变、直到政变发生的时刻，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和组织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云云^①。不仅如此，1933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依然重复“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但是事实截然相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不是希特勒的政策自身，而是斯大林的政策为希特勒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今天，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就不能不承认托洛茨基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里想附带说几句。在德国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不再满足于以往的改革共产国际的方针，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决心并呼吁创建新的革命国际——第四国际。这大致是在1933年的夏季前后。关于第四国际，在后面还要稍微谈一点。接着，从1935年初起，托洛茨基采用了前文已做过说明的、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的方针，即从以往的对苏联进行改良的政策转变为依靠群众武装起义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的主张。

4. 人民阵线批判

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约一年，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火星就飞

^①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第257页。

到了邻邦法国。1934年2月6日，右翼法西斯主义团体——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等——借斯塔维斯基※事件而发起暴动，达拉第政府垮台，出现了前总统加斯頓·杜迈格的半法西斯主义政府。但是工人阶级立即发动了对右派的反击。虽然法国共产党开始还根据“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参加了由法西斯分子筹划、领导的反达拉第政府示威，但是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论。1934年7月，社会党、共产党签署了统一行动协定。到了10月，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又进一步提倡组织“争取劳动、自由与和平的人民阵线”，并呼吁保守派左翼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党，即达拉第、埃里奥、肖当领导的激进党（激进社会党）参加这个阵线。这样，社会党、共产党两党的联合阵线就发展成有资产阶级激进党参加的人民阵线。

到了1935年，人民阵线已经形成。1936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人民阵线纲领》。在1936年4月末、5月初的众议院选举中，人民阵线在六百一十八个议席中获得了三百七十五个，从而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共产党从1932年5月选举的七十九万票倍增为一百五十万票。社会党尽管有1933年的右派脱党，也依然能够维持一百九十万票。共产党的议席从十二个猛增为七十二个，社会党则从（1932年5月的）一百二十九席变为第一百四十六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尽管有社会党、共产党的富有牺牲精神的援助，在1932年选举中扩充到一百五十七个席位的激进党还是席位锐减，丢掉了四十二个席位。因此，6月4日，以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为总理，激进党的肖当为副总理的人民战线内阁，即由社会

※斯塔维斯基（1886——1934）俄裔法国人，以1933年的债券诈骗事件而闻名。由于激进社会党内阁的成员卷入这一事件，因而发展为丑闻，给了右派以攻击政府的良机，肖当内阁因此下台，斯塔维斯基本人也在警察行将逮捕他时自杀——译注。

党、激进党、社会主义共和联盟组成的勃鲁姆内阁取代了萨劳内阁（右翼激进党）。而共产党，据多列士说，由于害怕入阁反而被反动派利用来进行攻击，所以没有入阁，而是保证在内阁外予以协作。其实，这是根本打动不了激进党的远虑！

在获胜的人民阵线政府下，法国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自1922年以来，分裂为社会党系统的劳动总同盟与共产党系统的统一劳动总同盟的法国工会由于1936年3月两者的联合而复归统一。要求增加工资、实行每周40小时劳动制、带工资休假制，要求承认工会、实行团体协约制等要求的运动如火如荼。自1936年5月底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罢工风潮，工会会员由一百万人激增至近四百万人。勃鲁姆企图使劳资双方妥协（内容包括增加工资7%—15%以及其他的协定），但是事态却未在此种程度上平息下来，静坐罢工波及全国。多列士也不得不恬不知耻地呼吁：“人民阵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每月一次的选举，而是在共和制度的范围内实行广泛的进步政策”，“同志们！我们必须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结束罢工”^①，等等。

当时先后在法国、挪威流亡的托洛茨基认为1934—1935年后的法国形势正处在一触即发的革命前夜，在人民阵线政府建立后，他写道：“法国革命开始了”（1936年6月）；他说，“斗争或是取得最伟大的胜利，或是遭到最可怕的失败”^②。据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说，保守派报纸《火车》把这次罢工称为“革命的大演习”。

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即所谓“法国的二百个家族”也进行了反击，计划将巨额法郎带往国外，特别是流往英国，等等。中间的、拼盘式的人民阵线政府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加上援助1936年7月面临佛朗哥叛乱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问

^①“人民的儿子”日本国民文库版。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47页。

题的困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软弱。1937年1月，勃鲁姆内阁终于声明“停止”实行人民阵线纲领。6月，旨在对付金融危机的财政全权委托法案遭参议院否决，人民阵线政府随即于6月21日垮台。这是一个寿命仅仅一年的短命内阁。此后，社会党、激进党又组织了第二个勃鲁姆内阁（1938年3月——4月），但也旋即下台。人民阵线本身也由于激进党1938年11月正式退出而在形式上瓦解。

以上简要叙述了法国人民阵线的历史。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进行了批判。其要点是：虽然形势处于革命前夜，但是人民阵线没有提出与这一形势相应的纲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是立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阻挠、背叛了革命。如果说“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时代是从极左方面歪曲、否定了统一战线策略，那么“人民战线”作为机械的反动，则是小资产阶级、右派歪曲这一策略的表现。因为，在依靠工人的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党的联盟下，人民阵线采取了“人民战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每月一次的选举，而是在共和制度的范围内实行广泛的进步政策”这种最大的改良主义政策。

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与激进党及其同类的联合，是用一系列庸朽形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联合”^①，“人民阵线是与中产阶级的最坏的政治剥削者相勾结的工人官僚的阴谋”^②，是“以工人组织的资本作担保的激进社会党的破产保险公司”^③。托洛茨基认为，不应在包括“法帝国主义的民主政党”激进党在内的人民阵线政府的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30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2卷，第14页。

③同上，第10页。

口号下，而应在建立“工农政府”^①这个中心口号下，有力地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是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这次大会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这条极左路线跳到了另一极——将“人民阵线”政策确定下来，并因此而出名。大会决议或季米特洛夫关于决议的讲演都认为，“它（指人民阵线——译注）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是承担了对法西斯主义及反动采取决定性措施和政府”。成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的形势虽然还不是直接的革命形势，但已处在了革命的前夜。人民阵线政府没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我们根据形势要求实行必要的、带有一定根本性的革命措施。例如管理生产、管理银行，解散警察并用武装起来的工人民兵取而代之。”但是，在法国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种主张。相反，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民兵的口号等还遭到了拒绝。在与激进党的同盟下，实现这种口号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人民阵线的实体是在与激进的资产阶级党的联盟下，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范围内实行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广泛的进步政策”。老实说，它也仅限于实施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反法西斯政策，而且这还是在革命前夜时期。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对策，而是小资产阶级、右派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利用。托洛茨基的批判全部是针对上述问题的。他下面的话是极有教益的：

“人民阵线的理论家的知识没有超出算术的第一条规则——加法。这就是说，把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算到一起要比它们中的每一部分都大。但问题是算术还不够用，至少还需要有力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在政治上也

^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策略纲领》，参看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52页以下部分。

是正确的。众所周知，各个力间的角度越大，合力越小。政治上的伙伴向相反的方向拉，合力就等于零。为了解决共同的课题，工人阶级的各个政治集团的联合是绝对必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这种联合可以吸引与无产阶级利益相近的小资产阶级大众。这种联合起来的共同的力会比凑在一起的合力大得多。相反，把当前这种在基本问题上利益成一百八十度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作为原则，只能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①

A·休特路姆塔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中说：“俄国政策、从而也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决定性转变（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转为人民战线论）是在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镇压纳粹党内罗姆叛乱的事件）后逐渐发生的”，“有两个因素，即以新盟国取代在德国失去了的支持的需要以及在法国自发产生的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制定了新策略。”^②这个观察是很中肯的。总之，在希特勒德国的威胁面前，克里姆林宫的外交谋求以法国为盟邦。而人民战线之所以不能越克里姆林宫外交的雷池一步，之所以只停留在与激进党的结盟政策和改良主义的最低纲领上，其根源就在于此。不应忘记：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时代与苏联的“大清洗”时期——苏维埃热月的总完成时期——几乎是在同时。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时代在苏联也就是施行决定性打击、最后扼杀十月革命的时代。

与法国一样，西班牙的人民阵线（1935——1938年）也扮演了背叛的角色。在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理论特点还特别在于，它与斯大林之流的二阶段革命论结合了起来。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教训》一文中尖锐地分析了被他称为“自由资产阶级幽灵”的阿萨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292页。

^②A·休特路姆塔尔《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岩波书店版，第2分册，第102—104页。

尼亚、巴里奥、科恩巴尼斯，社会党右派普里埃特、内格林，社会党左派卡巴里埃罗，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等集团是如何背叛的。并指出，其中社会党右派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尤为恶劣（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介绍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论述了，请看《托洛茨基选集》第8卷的文章。同时，还需要读一读菲利科斯·莫罗按照托洛茨基观点撰写、现代思潮社出版的《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此外，最近还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西班牙内战研究著作的日译本（伯尔恺诺、布列南、奥尼尔、托马斯等人著），如能读一读就更好了。古里比奇的《斯大林时代》（根峰译）也是必读书）。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者尽管是一个只有十六个议席的小党，却依仗俄国的援助作交换而滥用权力，设立了“党监狱”、“党警察”，犯下了大量格伯乌式的“清洗”罪行。如果搞一个西班牙人民阵线清洗史的调查，将会令人怵目惊心。“内格林——斯大林专政”的主要受害者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左翼——安德列斯·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先进分子。陶里亚蒂在论述《通往社会主义的各种途径问题与人民阵线政策》时，对西班牙人民阵线尤为称道，认为在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方面，它给了人们以重要的启示^①。这是毫无道理的。西班牙人民阵线不仅表现了人民阵线政策的右倾性，而且恰恰也是说明了斯大林主义犯罪性质的一个例子。

5. 关于党的组织理论

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离不开组织问题。尤其鉴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之流的所谓党组织是铁板一块的理论的反对者，所以最后

^①陶里亚蒂《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9页。

在这里应该稍微看一看托洛茨基关于革命政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在前文解释不断革命论时曾谈到，1917年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战略论上固然存在分歧，但在组织理论上的对立所占比重更大。托洛茨基自1904年下半年起，站在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以为两派将由于“社会革命的宿命论”而谋求联合。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关于联合的言论津津乐道。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曾经反对过列宁的组织论，即反对列宁在著名的《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理论。他在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我们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批判了列宁的组织理论，他说：“在党内政治中，这个方式……将导致以党的组织代替全党，以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的组织，最终以个人‘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①。但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服从列宁，认为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然而，可以说，在战略论方面反而是列宁向托洛茨基靠拢。前述越飞遗书中的话若是事实，那么这种靠拢则是为列宁所承认的）。

然而，托洛茨基强烈批判了列宁死后的斯大林的组织理论——所谓一块铁板主义。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是“民主集中制”理论。它一般强调反对党内派别及出现暂时的思想集团。托洛茨基对之进行了批判，他说：

“当出现某些问题争论及意见分歧时，不仅苏联共产党，就连共产国际以及其所有支部的领导层和机关报都径直把争论变换为集团和派别的问题。而没有暂时的思想集团的形成，就不能设想党的思想生命。还没有人发现与此不同的道路，而企图另辟蹊径的人只能表明他们的补救方法仅仅是在扼杀党的思想生命。当然，种种集团化和意见分歧是‘恶’的。但是就如同形形色色的毒素存

^①丹尼尔斯基《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31页。

在于人体生命之中并构成人体生命一样，这个恶是党的辩证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这些集团化变成组织起来的、更封闭的派别是更大的恶。党的领导艺术实际上就在于防止这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可能仅靠禁止来取消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最能证明这一点。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之际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动及富农反叛的余波冲击下，列宁促使通过了禁止派别与集团活动的决议。在这里所说的集团活动，不是在党的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暂时的倾向，而应理解为与那种掩盖自己从事集团活动的十足的派别相同的东西。党员群众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致命危险，用通过禁止派别和宗派主义这种严格而又僵死的决议来支持他们的领袖，但是党完全明白，这个公式将由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来做解释，即这个公式不会被不忠实地、粗暴地解释，更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等（参看《列宁遗书》）。党知道，在整整一年后，或在三分之一党代表提出要求的一个月后，将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研究它的经验，如果必要可提议加以调整。……但是，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派别和集团活动的决议即便在当时也要求有深思熟虑的解释和运用，它决不是脱离国家、形势和时期，凌驾于党的其他一切要求之上的绝对原则。列宁离去的党的领导机关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一切批评，在形式上遵循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活动的决定，但是这样做是为了日甚一日地镇压党内民主，同时却几乎不可能实现其真正目的，即消灭宗派主义。因为，任务不是禁止派别，而是使之消亡。”^①

这是在1928年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陈述的观点。其后，在《被出卖的革命》（1936年）中，托洛茨基写道：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46—147页。

“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为特征的。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的结合一点也不矛盾。党不仅总是注意到严格规定党的范围，而且十分注意给予这个范围内的人以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实际权利。批评自由与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不可动摇的内容。现在的所谓布尔什维主义不能默认派别的理论，是衰落时期的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各派斗争的历史。负有在扭转乾坤的旗帜下统一最勇敢的破坏偶像者、战士、叛逆者任务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怎么能够没有思想斗争，没有集团活动，没有暂时的派别形成而生存、发展呢？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的高瞻远瞩常常能够缓和与对立，缩短派别斗争的时间，但是却不可能做得更多。中央委员会依靠的就是这种喧嚷嚷嚷的民主的支持。由于这种支持，中央委员会才会有决定和发布命令的勇气。领导部门在一切危机阶段所采取的明白的、正确的立场使之享有崇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恰恰是集成的无比宝贵的精神资本。”“伴随着新的、巨大任务，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必然会在内部产生不一致。在国内暗地活动的反对党通过种种渠道向唯一合法的政治团体施加压力，激化了派别斗争。在内战结束的时刻，这种斗争甚至采取了震动国家权力的尖锐形式。1921年3月，在为数不少的布尔什维克参加了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发生时，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采取禁止派别活动的措施，即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转用于执政党的内部生活。这种对派别活动的禁令应该是在形势出现重大好转后立即废除的非常手段。同时，中央委员会在运用这个新章程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唯恐它会扼杀党内生活。但是，真正的意图虽然不过是不得已而对困难形势采取的让步，但是却正中官僚的下怀。”^①

^①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99—100页。

将以上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暂时的思想集团的活动是不可避免的，禁止它党的思想生命就停止了；第二、封闭的派别诚然是不如人意的，有必要使它消亡，但这有赖于领导机关的能力。禁止派别不是绝对的原则，而不过是在紧迫的国内外形势下暂时采取的非常措施。或者说，只有在出现了“害怕长期麻痹斗争能力的某种派别”时方允许取缔。这就是说，禁止派别不应该成为原则。托洛茨基这样谈到了它的根据：“在禁止形成派别的第十次党代会之前，苏联共产党已经在不禁止派别的情况下存在了二十年。”；第三、在相当多的场合，党的官僚化是形成封闭的派别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在于党的领导机关。

总之，托洛茨基的根本态度是：“不是禁止派别，而是使之消亡”。因此，他强烈要求党内民主，批判斯大林的铁板一块主义决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起了列宁对布哈林说过的话。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说：“如果你把不大驯服的聪明人统统赶跑，只留下驯顺的笨蛋，那么的确会使党垮掉。”^①

与1921年禁止派别有关的，还有一个取缔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其他政党的问题。这一取缔发生在禁止派别之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文中已经谈到过了。在此只介绍托洛茨基的解释。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这篇有趣的文章中说：

“取缔苏维埃各党一事根本不是源出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它是在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满目荒凉的落后国家保卫专政的一种手段。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明白，其后通过在执政党内禁止派别而完成了的这种手段预示着可怕的危险。但是这个危险的根

^①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336页。

子不在信条和策略之中，而在专政的物质方面的薄弱，其国际国内形势的困难里，即使只有德国革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苏维埃其他各党的必要也就烟消云散了。导致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法的出发点是单一政党的统治，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这一发展的前提既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取缔其他政党这一临时战时措施，而是欧洲和亚洲无产阶级的诸多失败。”^①

6. 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运动以所谓第四国际的运动而知名。它的正式成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前的1938年9月。9月3日，在巴黎郊外某地（出于自卫，公布时说成了瑞士）举行了创建会议。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荷兰、希腊等大约十个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著名的《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迄今为止，第四国际已经召开了几次世界性大会，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它的第一次创建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前，第四国际还有其创立的前史。在这本小书的第1章写到的苏共党内斗争（特别是斯大林、布哈林派与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中就有着它的萌芽。第四国际运动的发初期可以从192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算起。但是，在1938年9月正式建立前，还有种种过程。1933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

实际上，在1933年以前，托洛茨基并没有想要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政党、新的革命国际以取代以往的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非但如此，他还强烈地反对这种主张。即便他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35页。

是被这些现存的组织开除的，他也仍然站在主张从内部对这些组织进行改革的“改良主义”反对派的立场上。1933年夏季，他才决心创建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新的革命国际。前面说过，促成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这一事实，即：斯大林派的共产国际及德国共产党自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后由于采取“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和策略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面前的惨败以及在这一失败后他们不做自我批评，可耻地自我吹嘘。目睹这一事实，托洛茨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再采用改革原有组织的作法已经没有用处，有必要成立新的组织。他从这时起开始呼吁创建第四国际，开始进入了创建的准备时期。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说：“需要重建共产党和国际”^①，说明了建设新的国际的必要。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作为苏联的落后性（农民的优势）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延迟（不存在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党）的后果而产生。”“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就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如果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的再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不可能只凭借自身的力量使布尔什维克党再生，不可能拯救无产阶级专政。”

我已反复说过，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是绝对反对新的党组织的。有个叫胡戈·乌尔邦斯的人，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左派的一名领袖，1926年底与路特·费舍女士及马斯洛夫等人一起被开除。1928年春，在德国国会选举前，为了推选独立的候选人，他组建了“列宁同盟”。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走向建立新党的第一步，因而加以反对^②。在托洛茨基派转向建立新党的方针的前一年，即1932年，他还谴责说：“在为改变老党的倾向做出某些认真的努力之前，作为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乌尔邦斯及其同事们所进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117页以下部分。

^②参看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第2卷，第442页。

行的组织新的共产党的举动是犯罪行为。”^①（托洛茨基与乌尔邦斯从1929年以来在苏联论上就存在对立。乌尔邦斯否认苏联是工人国家的主张，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我看来，托洛茨基与乌尔邦斯的分裂是国际左翼反对派运动中的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件。因为，当时的德国共产党是仅次于苏联党的大党，而乌尔邦斯则是德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还是1923年汉堡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希特勒执政前，他一直举着“共产主义旗帜”从事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死在了瑞典的流亡地。）

但是，到了1933年夏，托洛茨基自己也决心从事这种“犯罪”行动了。同时，在这里我又想起，在1933年转变为这个建立新党的方针后不久，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国家的问题上也变以往的“改良”方针为“政治革命”（“第二次补充性革命”）的主张。这一转变发生在1935年初。关于这一点，前面已作了介绍。

1929年，被迫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一到土耳其，就给被认为是反对斯大林派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写了署名为古罗夫的信，发行了《反对派通报》（1929—1939年），企图结成国际性的反对派。当然，如前所说，在1933年夏季前，这并不意味着建立新党，而是要组织旨在革新、改良共产国际、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反对派。在此期间，即在1929—1933年间，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称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左翼反对派的派别组织，1930年4月在巴黎召开了这个派别的国际会议。1932年，在托洛茨基参加下又召开了哥本哈根会议。我在其他章节里讲过，反对派在这个时期以最大的精力投入了反对斯大林派的“第三时期”政策即“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和策略的斗争。但是，这一批判没有被斯大林派接受，在共产党惨败给纳粹德国后，反对派终于变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7卷，第252页。

更了政策，呼吁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所以1933——1938年成为建立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准备时期。

1933年夏，当时英国的独立工党（ILP）向不属于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组织呼吁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希特勒胜利后的形势和运动，会议发表了《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托洛茨基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的工人社会党（SAP）以及荷兰的两个组织革命社会党（RSP）和工人社会党（OSP）在宣言上签了名。这份声明宣告了建立新的革命党、新的国际的必要性，谈到了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则。1936年，托洛茨基派召开了国际会议，托洛茨基在会上曾希望宣布成立第四国际，但由于为时尚早，没有被这次会议通过。1938年9月，在巴黎郊外召开的国际会议宣布了（虽然也有人反对）第四国际的建立。同时，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著名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①，纲领由以下的二十一个项目构成：

①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②无产阶级及其指挥部；③最低纲领和过渡纲领；④资金滑动制与时间滑动制；⑤过渡时期的工会；⑥工厂委员会；⑦“营业秘密”与产业的工人管理；⑧各个资本家集团的掠夺；⑨剥夺私立银行与信用制度的国有化；⑩纠察线——卫队——工人民兵——无产阶级的武装；⑪工农联盟；⑫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⑬工农政府；⑭苏维埃；⑮落后国家与过渡要求的纲领；⑯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纲领；⑰苏联与过渡时期问题；⑱反对机会主义与不讲原则的修正主义；⑲反对宗派主义；⑳为女工和青年开路！㉑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分为以上项目的过渡纲领是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章认为国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43—298页。

际上的客观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而革命的主观条件则大大落后于这种客观条件，处于危机中。在这种认识下，文章提出恢复和重建真正的革命指挥部，提出了这个指挥部所应采取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政策和要求。因此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名为“过渡纲领”。

在这里不可能逐一评论这个纲领，但是应当来谈一谈托洛茨基当时的预测；即托洛茨基认为世界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行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先进国家造成“十月革命的继续和扩大”的预见。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在一篇论文中作了这样的批评：

一、这个纲领指出了，在1938年9月前的直接阶段上，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指挥部，特别是由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人民战线”论等，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地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失败极其惨重。纲领虽然谈到了这些大失败，但是却认为当时处于革命前夜，过于低估了这场大失败。因为如果遭到失败，要恢复过来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这一点却被忽视了。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发生的“大清洗”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最终确立，是苏维埃热月的最后完成。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在肉体上被消灭，所以俄国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失败是不应掩盖的。然而托洛茨基过低估价了这一点，他认为，“大清洗”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危机的表现，他甚至预期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后官僚专政就会衰败^①。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倒台，它不仅使自己维持了下来，而且还扩大到东欧和中国。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在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俄国的大失败是很重要的，这些失败重大到不能容忍把形势规定为革命前夜。但是，纲领正是建立在过低估价乃至忽略这些失败的基

^①参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础上的。

三、纲领在一开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中这样主张：

“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条件，一般已达到资本主义下可能成熟的最高点，人类的生产力失去了活力。新发明和改良已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下的周期性危机，把不断增长的损失和苦难加在群众身上。一方面，扩大了失业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瓦解着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从破产到破产，处在风雨飘摇中。

资产阶级自己也走投无路。在已经不得不把最后的王牌押在法西斯主义上的国家，资产阶级如今正闭着眼睛在经济破产、军事灭亡的道路上向下滑。在拥有历史特权的国家，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以国民积累为牺牲，醉心于民主这种奢侈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资本的所有有传统的政党都处在丧失意志前的混乱状态。‘新政’尽管是初期的表面的决心，但也仍然不过是只有在资产阶级成功地积累了无限财富的国家才可能有的、政治混乱的特殊形态。显而易见，由于目前这场不知何日结束的危机，同法国的人民战线一样，‘新政政策’也打不开钻出经济上的死胡同的新道路。

国际关系也不妙。在加大了资本主义瓦解的紧张形势下，帝国主义的对立陷入僵局。在这种对立的极点，各个冲突及流血的局部动乱（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远东、中欧）就会合为一体，引起世界规模的大火灾，这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当然清楚新战争对他们的统治有致命危险，但是与1914年的前夜相比，这个阶级目前更无法避免战争。

一切宣传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人，不是无知，

就是故意撒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不仅‘成熟’，而且开始熟过了头。……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国家和国际关系完全被带有社会革命前夜特征的社会危机挫伤了。将革命前夜状态转化为革命状态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是……无产阶级指挥部的机会主义性质。”

但是，前面说过，世界资产阶级到这时已粉碎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抵抗，摆脱了1929—1932年的世界大危机，正式向资本家社会解决资本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家占有的矛盾”）的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转化。然而，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一般以资本主义危机的各种因素为直接媒介，但同时也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它在资本家社会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承认了生产的社会性质，所以“这些制度的稳定性是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高度成正比的。没有这种稳定性，资本主义甚至在历史交给它的这段时期内也活不下去。”^①可是，托洛茨基的纲领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世界大危机、其后发生的1937—1938年危机及战争危机印象强烈，对当时资本向具有这种性质的阶段正式转变没有做深刻的思考，纲领是建立在轻视乃至否定这种转变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在1939年还谴责乌尔邦恩斯说：“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胡戈·乌尔邦斯得出结论说，‘国家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他还举出了意大利、苏联、德国作为这种制度的例子。”^②

从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观点出发的托洛茨基的纲领中的建立新党的方针如果是在他流亡国外后、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提出的，那么它大致上还是合时宜的。但是岁月流逝，在1938年，它已经过时了。特别是俄国、德国、法国无产阶级的大失败已经不允许将

^①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3页。

形势规定为革命前夜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可利用于革命的良机，但是在大战过程中及战后，却没有能够象托洛茨基所强烈期望的那样，在先进国家出现“十月革命的继续”。

笔者到现在大体上也是这样看的，这一点暂且不去谈它。在大战爆发初期，1939年8月到1940年4月，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国际书记局移到了至今尚存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美国——也由于对苏认识的分歧而发生了严重分裂。

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苏联问题。看起来造成托洛茨基派和广义的左翼反对派分裂的大体上是以苏联问题为中心的。第一次是联合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萨布罗夫等人）在1926——1927年间的分裂，中心问题在于是否承认苏维埃热月是既成事实。第二次与第一次差不多，是托洛茨基与德国左派乌尔邦斯间以东支铁路事件为契机而出现的分裂（请参看《托洛茨基选集》第9卷《捍卫苏联与反对派》一文）。第三次是在1939年8月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时，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中发生的分裂。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得力领袖之一马科斯·夏哈托曼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的当天宣称：“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及未来前途，下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应该从讨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开始。”同年9月，该党的一名领导人、哲学教授詹姆斯·伯纳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争性质”的文件，对以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人国家说提出了疑问。托洛茨基的苏联论已经在第三章里做了大致的说明。托洛茨基从“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打倒斯大林主义者官僚，无条件捍卫苏联！”的政治口号。伯纳姆和夏哈托曼反对这种“无条件捍卫”，并追本溯源，反对“工人国家”

说。

这场争论从1939年8月持续到翌年的4月，虽然托洛茨基反对组织上的分裂，但是结果在1940年4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大会上，托洛茨基和詹姆斯·坎农的多数派与夏哈托曼、伯纳姆的少数派决裂。《捍卫马克思主义》^①就是汇集托洛茨基此时的论争文章而成。另一方面，记得在前一章说过，夏哈托曼及伯纳姆的苏联论就是“官僚集产主义”说。他们放弃了“捍卫苏联”（伯纳姆在其后写了著名的《经营者革命》，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夏哈托曼后来组织了“独立社会主义同盟”，现在这个组织也未与其他组织合并。夏哈托曼原来处在托洛茨基派发言人的地位上，是托洛茨基著作的英文译者，学识渊博的雄辩家，撰有许多论著）。

不言而喻，这场分裂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很大的损失。但是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损失是正在执笔撰写未完成的大作《斯大林》的托洛茨基的被暗杀。这一暗杀的背景还有不详之处，但是格伯乌的走狗、西班牙人拉蒙·摩尔纳尔（还有他的生母卡丽达雅·莫尔纳尔）是受指使犯罪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次暗杀发生前不久，第四国际为了对付1939年9月初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0年5月在美国召开了紧急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古巴、阿根廷、智利等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代表参加。其主要宣言——《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②由托洛茨基起草而成，这可以说是托洛茨基最后的政治论文。

分裂加上失去最高首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战争中被削弱，但是却未被全部消灭。这一运动不分纳粹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律实行失败主义，而对苏联则采取保护方针。

①《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

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

它的国际书记局依然在活动，相互失去联系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欧洲大陆活动，特别是在纳粹占领地区，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牺牲者。在东方，特别是锡兰※的“平等社会党”（SSP）（它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在锡兰比斯大林派的共产党更要有势力）1914年就加入了第四国际。印度、缅甸、中国也有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日本一个也没有！）。

在欧洲，1943年首次成立了临时书记局，发行了法语机关报《第四国际》等。1944年2月，据说在占领下的法国某处，欧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召开了六天秘密会议。在战后的1946年，欧洲大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美国、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此后，在1948年4月，即恰恰是在1938年第一次大会后十年，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以后又召开了第三次大会（1951年9月）、第四次大会（1954年）、第五次大会（1957年）、第六次大会（1960年）……大约每三年召开一次世界大会，制定各种方针，做出各种决议。

但是，作为战后托洛茨基主义国际运动所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种种分裂。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分裂都是以苏联问题为中心的。其实还有另一个。这就是被称为“加入战术”的组织策略问题。战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与此关系很大。

前面说过，1933年夏季以来，托洛茨基转而实行否定过去的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建设新党的方针。由于自己的组织处于很大的劣势，所以暂时加入社会党，致力于赢得群众、扩大本身组织的方针也得到了考虑。这一方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民战线”运动时代（1934——1938年），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生命。

※现在的斯里兰卡——译注。

由于当时的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右翼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的建立，为数不多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陷入了极端孤立和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在托洛茨基的劝告下，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被建议加入法国社会党。这个加入策略虽然得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国际会议的认可，但是据说也有一些反对者（有一种说法是，在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时代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进行活动，后终于被斯大林派杀害的著名的安德列斯·宁等人就曾反对这个策略）。

一方面一概否定现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主张建立新的革命党，一方面却又宁为一时方便，主张抛掉自己的独立组织，加入现有组织中。这种有点自相矛盾的主张在列宁的组织理论中是不存在的。也许有人会说，列宁不是曾劝告英国共产党采取加入英国工党的“加入策略”吗？但那是例外的特殊情况。

1920年8月建立的英国共产党十分弱小。与此相比，由于拥有四百万成员的“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的普通政党大不相同”^①，所以它是工会的政治部分的延伸，是工会的政治联合体，具有加盟的性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顾相当大的反对，通过了这个加入策略。1921年12月发表的著名的统一战线策略纲领也指出了这个特殊条件：“当然，英国在这一点上是例外。由于特殊情况，英国工党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工人联合体。”^② 1922年3月的一个关于英国问题的决议基于“工党是工会的政治组织，在该党中包括了诸如独立工党、费边派、行会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政治倾向”^③——用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演说中的话说，英国

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43页。

②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日译本，第1卷，第290页。

③同上，第309页。

工党的这种特殊性说明它“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党”——从而对加入工党表示宽容。

但是，这决不是无条件的。“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有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①。加入策略就是带着这种不可动摇的条件的。

因此一般说来，不应绝对地承认加入策略，何况在转而实行建立新党的方针的同时采取加入策略就陷入了折衷主义或二元论的矛盾，是错误的。“加入策略”的方向不是其他“党”，而是工会。

我就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总之，这个“加入策略”大大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四国际。战后的“加入策略”在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51年9月）上被作为普遍方针。围绕着这个加入策略，以元老詹姆斯·坎农为首的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得到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局支持的希腊人米歇尔·帕布洛的一派发生了意见对立。战后的“加入策略”与战前的短期“加入策略”有所不同，它是相当长期的，加入的对象不仅是社会党，而且还有共产党。虽然坎农派对这件事本身并不那么反对，但是问题是，帕布洛派主张，应该把加入策略扩大到东欧各卫星国的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这就有了争论。

坎农派强烈反对帕布洛派的这一主张，这个问题的根子就在对战后苏联阵营的意见分歧上——前面说过，托洛茨基在1933年乃至1935年前的对共产党政策及对苏政策还是“改良”的——帕布洛派列举了战后形势的变化，提出对斯大林派共产党和苏联国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08页。

家采取近于复活这种“改良”的态度，而坎农派则依然继续主张奉行1933年及1935年以后的方针（否定斯大林派共产党，在苏联阵营内进行“政治革命”）。加入策略这个组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反映了这种根本性的对立。总之，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秋，两派分裂为国际书记局（帕布洛派）和国际委员会（坎农派）。在此之后，据说帕布洛被捷尔曼（比利时人）和彼埃尔·弗朗克（法国人）开除，上述分裂得到弥合，又复归统一。也有人说，还有别的分裂。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这以后的第四国际的情况资料参照，不能正确地加以记述。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失去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前途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我在前面曾经引用过拉雅女士的话：“由于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等于国有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区别，所以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斗争，但是它的思想却不可能有力量指示独立的方向。”我的看法与拉雅女士的一致。对托洛茨基尚且可以如此说，对于作为托洛茨基追随者的托洛茨基死后的第四国际就更是如此了。我在前面说过，如果托洛茨基活到战后，他一定会象他的未亡人那样摆脱他的国有拜物教。而他的追随者却比托洛茨基还要顽固地信奉国有拜物教。这些追随者将只能停留在对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亚洲变种毛泽东主义采取所谓“左翼策略”的反对派的水平上。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

〔补记〕

我认为，现代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必须分析下列诸点，为了征求研究同道的意见，把我的构思写在下面，

一、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动因和诸形态

① 西欧国家（特别是美国）

②斯大林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

二、国家资本主义下经济运动规律的变化

①国家资本主义与价值规律

②国家资本主义与危机

③国家资本主义与利润率下降规律

三、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危机问题

①国家资本主义与庞大的军国主义的结合——浪费与经常性的战争危机

②物价上涨、慢性通货膨胀

③自动化与失业

四、改良主义的基础和作用

①斯大林主义(包括毛泽东主义)

②社会民主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